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使命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西班牙] 奥尔特加·加塞特 著
徐小洲 陈 军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



A10073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使命/(西)奥尔托加·加塞特著;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2002.6重印)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ISBN 7-5338-3996-X

I.大... II.①加...②徐...③陈... III.高等教育—教育改革—研究—欧洲 IV.G649.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8693号

责任编辑 周俊
装帧设计 王大川
责任出版 温劲风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大学的使命

[西班牙]奥尔托加·加塞特著

徐小洲 陈军 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政编码:310006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5 字数 82000

2001年12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2次印刷

*

ISBN 7-5338-3996-X/G·3966

定 价:7.00 元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

编译委员会

总主编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 力 杨 明 吴雪萍

何曙荣 汪利兵 张民选

张维平 郑继伟 顾建新

黎学平

《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总序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西方大学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关于大学自身及高等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加。这一现象与同一时期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大学作用不断提高的趋势是相吻合的。学者的研究涉及高等教育发展的许多问题,包括它的历史、作用、职能、理念、体制、政策及面临的困境,等等。有关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对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和大学自身的改革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国外高等教育的理论,并联合原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组织翻译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

论——多学科的研究》、《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和《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等高等教育研究名著。在较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项研究工作对推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纷纷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博士点、硕士点不断扩大,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队伍已颇具规模,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也日益成熟起来。相比之下,对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薄弱。国外许多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著作——无论是几十年前的还是近些年的——目前在国内仍知之不多。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为此,浙江大学教育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又选译了部分国外高等教育的名著,供国内同行和广大高教工作者研究参考。

对研究、翻译和出版国外高等教育名著这项重要工作,浙江教育出版社自始至终给予大力支持。在《汉译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丛书》出版之际,谨向浙江教育出版社表示由衷的谢意。

王承绪 徐 辉 徐小洲

1999年6月

译者前言

奥尔托加·加塞特是 20 世纪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从事过教师、作家、出版商兼编辑、哲学家和政治家等多种职业。他于 1911 年被聘为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任职长达 20 年之久。他富有时代感,思路敏捷,并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一位富有号召力的教师,深受学生欢迎。

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敏锐的思维使得奥尔托加具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广阔视野,并在众多领域取得成就。他编著的《群众的反抗》和《现代题材》等著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学的使命》是他在应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邀请所作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讲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言简意赅,紧扣西班牙乃至欧洲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以其犀利、流畅的笔锋,痛快淋漓地剖析了欧洲大学的弊端,进而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独特的改革思路,读来使人倍感清新,并发人深省。

一、改革的原则

奥尔托加一直是政治和教育体制改革的竭力提倡者。他

认为,政府和大学好比是机器,由于长期的使用甚至滥用,已变得破损不堪,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关键并不是是否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的问题。但是,他的主张不仅没有得到采用,反而受到了打击。他在《大学的使命》中不无伤感地说:“从我第一次撰写有关西班牙政府进行总体改革,尤其是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到现在已有近二十五年的时间了。任何敢说‘改革’两字的人,甚至那些只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改革是恰当的人,实际上也被宣布为疯子和亡命之徒。而且,不管是谁,还会被正常的西班牙社会所摒弃,注定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仿佛改革就是麻风病。这种对几乎不容置疑的改革抱敌视态度的出现,你们不要认为是由于改革者是一批激进分子,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即使是思想最温和的人一提到改革也会遭到排斥和摒弃。当时在西班牙对任何改革,包括对政府和大学的改革,都采取了一种普遍保守、固执的反对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当中那些赞成改革和倡议改革陈旧模式的人士一次又一次地被称做‘大学的敌人’。”^①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大学养成了一种恶习——懒散草率。懒散草率的作风一旦出现,会给人带来一种舒服安乐的感觉,且易于传播,变得习以为常,从而得以长期存在。从政府和官方行为到家族生活以及个人的言行举止,它已渗透到了西班牙的方方面面,充斥了西班牙的整个国民生活,并起着左右和引导生活的作用。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28页。

懒散草率使得政府在发挥其功能时缺乏规范、自尊和条理。政府在与国民打交道时采取懒散草率的态度,利用法律进行欺诈,把法律变成欺骗民众的工具。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急状态期间批准通过的所谓《生存法》成为一纸空文。各省也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一种犯罪,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渎职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大学教授会议上也充斥着这样一种懒散草率的气氛。例如,当你穿过大学里的一间间教室和大厅,甚至是在平时,见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动作和姿态,都会感受到一种使人窒息的沉重的懒散气氛。

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呢?他引用了一个体育运动词汇——良好的竞技状态。一名运动员竞技状态好和坏使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显然,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要经过争取才能达到的。为了达到良好的精神状态,他必须使自己集中精力,放弃其他许多事情,还要具有超越自我的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加机智、兴奋和敏捷。简言之,良好的精神状态意味着不沉溺于种种无意义的消遣之中。

正像一个人一样,群体的精神状态也可能有好有坏。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是那些拥有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之中,每位成员在关键时刻都不会令对方失望,整个群体可以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迅速前进。

奥尔托加对当时西班牙是否有这么一个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担负起改革政府和大学的使命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体,所有的努力会因群体缺乏必备的素质而失败。正如懒散草率是邪恶之源一样,一场本质上懒散草率的改革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有害的。西班牙独裁统治时期所实施的变革,就已经把懒散草率引入极其疯狂的境地。

但是,他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阻挡的,结果是多数人征服少数人。他告诫大学生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介入西班牙的公共事务——向政府请愿、参与大学的改革。

他还认为,历史不总是渐进的,也可能跳跃式前进。他认为,每一项历史成就都是通过逐步取得的观点,去明辨过去一个世纪犯下的每个典型的错误。考古学家直接在金字塔底挖掘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遗迹就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的跳跃式的突变能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因此,具有良好精神状态的一代人能够完成几个世纪来未能实现的目标。

奥尔托加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纠正一些弊端。弊端本来是指那些少见、违背常规的行为。然而,一旦这些行为变得非常频繁、习以为常、根深蒂固,并且被大众普遍默认,那么它们就不能再称做弊端了。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弊端可能会自动纠正;另一种是这类常见的弊端已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不再被视做偏离常规。为此,需要对常规做法加以分析。按常规方法建立的机构是否健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看它是否有能力容纳大量无严重危害的弊病,就像一位健康人能够承受住令病弱者倒下的压力一样。但是,在一个机构的确切使命尚未确定之前,它是不能完全按常规做法建立的。机构犹如机器,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设计必须考虑到它预期的服务职能。换言之,大学改革的实质是为了能够系统地实现其目标,因此,对我们的大学目标只作一些调整、修饰或变更,最终只会空欢喜一场。

大学的改革如果仅局限于纠正大学中懒散草率的弊病,那么改革也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草率。重要的是大学应该

重新认识其使命,使大学活动真正发挥出应有的力量。

他认为,在过去的15年里,西班牙所作的最好的尝试只是仔细地观察其他国家大学改革的情况,仿效别国的做法。这种仿效会犯下致命的错误。首先,在仿效的过程中,我们回避了为试图解决问题所作的种种具有创造性的努力,从而不能从中认识到借用别国方法解决问题的真正的本质,也无法认识到其中的局限和缺陷。由于我们最优秀的教授对于自己的问题一直是愿意仿效他人的做法,不愿自己去思考,因而他们除了在自己局部的具体研究领域能跟上时代步伐之外,在许多方面生活在一种落后时代15至20年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悲剧性的迟滞现象,也是人们自己不经努力就想证明自己、树立自己的信念而遭受的命运。

其次,我们迄今为止所作出的仿效的依据一直是一个谬误:仿效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直接来自19世纪沿袭下来的。例如,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一世,就说:“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学院的运动场上赢得胜利的。”俾斯麦战胜了拿破仑三世,就说:“1870年战争的胜利是普鲁士校长们和德国教授们的一场胜利。”奥尔托加指出:“这些陈词滥调式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思想错误的理由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即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它把学校认定为是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学校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①当然,一个伟大的国家,必定有伟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37页。

大的学校；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如果一个民族政治腐败，那么它试图拥有完善的学校体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是为那些远离广大民众的少数人服务。

他由此得出一个教育原理：“如果学校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机构，与其内部人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大学的使命

奥尔托加认为，我们应该直接地、明确地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应该干什么。这是与大学的改革直接相关的。

大学是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欧洲的大学也有共同点。他认为，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我们发现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是那些本可以接受和应该接受的人，他们都是富人的孩子。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能否让工人阶级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把大学的知识传播给劳动者。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对政府进行一次伟大的改革。

那么，大学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包括下列三项：文化传授，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大学通过履行其职能，使人们成为医生、药剂师、律师、法官、经济管理者、公务员、中学理科和人文学科教师等等。

(一) 文化传授

奥尔托加论述了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第一,文化不是科学。文化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有其独立性。500年前,人们把信念寄托在教会身上,因此,文化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会。其次,文化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科学对宇宙世界未作出科学的解释之前,生命是不能等待的,而且我们在未作好准备之前也不能把生活往回拖延。生活总是急迫的,它是直截了当地面对着我们,容不得任何的拖延。作为生活诠释的文化也不能够等待。他认为,文化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就像手是人的一部分那样。人没有手就不再是正常人了,是残疾人。没有文化的生活同样也是如此。没有文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不真实的生活。但是,科学的内部运作与生命无关,它对我们生活的迫切需要无动于衷,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需求。所以,科学的发展永远是无限限制的,只会越来越多样化、专门化,永无止境。再次,文化需要我们对世界和人类具有一个全面的思想认识,它不因科学绝对精确的理论、方法碰巧完结而停止不前。这就使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

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在大学里,假如文化和专业都孤立存在,与蓬勃发展的科学和各种研究没有任何接触,那么,文化和专业无需多长时间就会被日趋严重的丧失活力的经院哲学所代替。文化借助科学解释了我们生命存在的现象。

奥尔托加指出,尽管文化如此重要,但是我们目前正在经

历着一个极度“无文化”的时代。“如今的欧洲正在自食恶果。造成目前欧洲形势动荡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普通的英国人、普通的法国人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文化修养,他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时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新的野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更没有文化修养,如一些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①这种状况使得欧洲人被彻底地摧毁,他们因此也就迷失了他们要求达到的方向。全面发展的完人是不会从像“工程师”这样只具备局部技术知识的人身上找到的。

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因此,奥尔托加主张在大学里开展文化教学,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体系。这是大学的一项驾凌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大学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他所说的“文化修养”,是指人的精神。在物理学和数学中没有“文化培养”可言,因为那只意味着使人在某一具体学科方面变得有学问。培养“基本文化修养”,应该向学生们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

实现大学的基本功能涉及教授一些重要的文化学科,即: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44-45页。

- (1) 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
- (2) 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
- (3) 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
- (4) 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
- (5) 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

(二) 专业教学

奥尔托加提出,专业和科学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例如科学研究,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大学直接的基本功能。从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单指调查研究,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及其解决的办法等。因而,一旦得出问题的解决办法,随后依照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然而,专业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医内科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专业。它是实践性的,以恢复和维护人类健康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医内科会吸取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成果;但同时又把科学研究的其余内容搁在一边,尤其是放弃最具科学特点的内容——疑难未定的问题的研究、解决等。这一点就足以从根本上区分医内科和科学之间的不同。

高等教育包含了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两部分的内容,不能把这两项根本不同的任务混为一谈。培养一名律师、法官、医生、药剂师、中学拉丁文或历史教师与培养一名法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学家、语文学家等是很不同的,前者是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工作者,后者则是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工作者。此外,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把符合大众需求的专业教

育与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科学研究活动糅合在一起是令人感到吃惊的。

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把普通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除了文化训练之外,大学还能够通过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优秀的医生、法官、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

(三) 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奥尔托加认为,大学不同于科学,但又离不开科学。

他指出,“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科学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尽管失去尊严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尊严是一个机构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的意义之所在。科学在大学里通过研究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得到发展。他说,如果科学在西班牙能够得到充分发展,那么科学会在大学里优先得到发展。近几年的一切改革都清楚地表明,要加强我们大学的研究活动和科学家培养方面的意识,使大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是创造,而大学的教学只是传播和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的东西。

他断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科学把普通人排斥在外,它所涉及的是一种非常少见、与人类一般常规活动相距遥远的行业,科学家就像是现代修道士。因此,妄称普通学生可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的表现。希望普通人成为科学家的妄想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即使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之一,它也不是惟一的,因为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同

样高尚的追求。牺牲那些同样高尚的追求而把人类的一切都献给科学,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崇高只属于科学,不属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学习或教授一门学科与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对担负学科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他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的话,那可能是最适当不过了。不过,这并非是绝对必须的。许多研究人员并不擅长教学,而且他们认为教学工作占用了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奥尔托加说:“我自己在德国几年的求学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曾和好多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关系很密切,但是我从他们当中还尚未发现一名优秀的教师!”^①事实上,一直以来,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并不是出色的研究者。虽然他们对自己的学科非常熟悉,但是熟悉并不等于研究。因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发现真理;反之是为了证明一个谬误。了解和熟悉一门学科是指对真理的吸收。

因此,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加以区分。把这两方面混淆在一起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和学习,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熟悉和掌握诸多学科的系统化知识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科学研究本身。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条总的原则。内科医生学习如何治愈疾病,而且作为内科医生他也不必再学得更多。就内科医生的目标而言,他需要知道当前最新的生理学知识体系,但他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保罗克根-特伦奇-丘伯纳图书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72页。

无需,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生理学家。对于想成为一名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人来说,在大学里的时候,迫使他零零碎碎地学习那些历史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须的技术而耗费时间是一个错误。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掌握人类历史总体部分的一整套明晰清楚、结构有序、易于理解的思想体系,这恰恰是他将来从事历史教学所需要的。

为此,奥尔托加批判了西班牙大学中的“唯科学主义”思想。

为了实现上述三项使命,大学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从严格意义讲,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

(2) 大学不会容忍教学大纲中有任何错误、虚假的内容存在,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学习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

(3) 大学避免使普通学生因自命将来会成为科学家而白白浪费时间的现象出现。

(4) 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的设置将会根据最好的教学法——系统、综合和全面的教学法——以一种合理的形式进行,而不是按科学喜欢的形式进行。

(5) 教师的选择将不是根据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职称,而是依据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教学才能。

(6) 当学生的学习期限从数量和质量上都缩减至最低限度时,大学将灵活地处理其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

三、教育的经济原理

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假如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时间分别都持续 100 年,或儿童和青少年都具有无限的智慧和注意力,那么就不会有教学活动存在。然而,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能力都非常有限,因此,需要教育的存在。

在原始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教育存在。那时候知识内容严重不足,任何人都不必特别费力就能学会和掌握,几乎没有教育的必要,甚至教学成了一项隐瞒知识的职业。例如,柏拉图的第七封书信向那些指控他曾把自己的哲学原理传授给了叙拉古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的人提出抗议。在他们眼里,把哲学思想传授给外人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

当需要获得的知识与学习能力不成比例时,教育就出现了。教育在接近 18 世纪中期时蓬勃兴起,并持续发展到现在,理由很简单:正是在那个时期近代文化首次走向繁荣,短时间内人类的知识宝库得以扩展。人类此时迫切需要学习远远超越其学习能力的大量知识,教育学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但是,即使目前这种教学只局限于专业,学生们仍有多得惊人的课程要学习;即使程度较好的学生面对大学要传授给他们的大量知识,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何况我们必须考虑到机构是针对天赋一般的常人而言的。对于一名普通学生来说,要掌握大学试图传授给他的所有内容是不可能的,因而接受失败已成为

大学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奥尔托加指出,一个机构试图给予其不能给予和得到的东西是虚伪的。然而,这种现象却存在于目前大学的整个规划和机构之中。因此,人们必须对目前的大学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必须严格坚持一条截然相反的原理——我们必须只教授那些能够被教授的知识,即能够被学生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教授认为应该被教授的知识。为此,大学的建设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我们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教学内容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把它看做大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过去的教育一直是以知识和教师为中心的,学生在教育学中根本不是一个基本要素。卢梭及其追随者把教育的重心从知识和教师转移至学生身上,这是教育学的一次重大变革。

那么,该如何确定课程体系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1) 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东西是学生将来的生活必定需要的。

(2) 对绝对需要的内容还必须进一步缩减,以使學生能够真正学会和理解。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已处于一种分散、零碎的状态。从各方面看,我们迫切需要对知识进行一次新的整合。如果科学使生活变得有条理,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对科学进行改革,使科学具有一种与人类生活相符合的形式。

奥尔托加的教育思想是在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哲学思

想对奥尔托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尔托加称他为“19世纪后50年里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另外,奥尔托加与和他同时代的循环论历史学家也有密切的联系。施本格勒(Spengler)、索罗金(Sorokin)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nold Toynbee)等人认为:历史按预期顺序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循环,如同赋有节奏一般;人不仅主要是理性动物,而且也是情感动物。这些思想启发了奥尔托加。从他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中,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奥尔托加和别的循环论历史学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施本格勒、汤因比等一直尝试通过归纳绘出一条综合、图式化的曲线,来描绘文化的兴衰。他们在预言未来时,明显受到这条理论曲线的轨迹的引导。奥尔托加通过深思熟虑和分析研究,注重系统地领会现代文明的含义。这是他的悲观的思想中积极的一面。

奥尔托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对他大加赞扬,有的人则竭力贬低他。为什么人们对奥尔托加的评价会如此褒贬不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批判精神。在漫长的公务活动和记者生涯中,奥尔托加表现出敏锐的分析能力和敢于指出错误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他抨击当权者滥用权力,并由此推断出,现代社会需要由知识界的杰出人物来领导。但是,他又认为浮夸和不负责任是欧洲“知识分子”常见的恶习,这是造成目前混乱局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对各派的错误都提出严厉的批评,使得被批评者都加入了批评他的行列。但是,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小心翼翼”的甘为当权者附庸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言论中饱含着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精神。正因如此,他被他的许多同胞誉为“共和国之父”。

奥尔托加长期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经验。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明显受到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他赞同教育必须个性化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所有人员都应该有机会享受这种教育。但是,他又认识到许多进步主义者忽视文化知识传授的缺陷,主张教育内容必须是所有学术领域的知识精华。这是值得肯定的。

奥尔托加对大学和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希望大学和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科学文化发展上起带头作用。他在对大学使命的设想中,提出的重视文化修养的培养、大学教育面向广大的普通人、教育的经济原理等观点,不乏值得我们今天吸取之处。

但是,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错误或不正确的观点。例如,盲目排斥外国人和外来文化,欧洲中心论,甚至糊涂地把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混为一谈。这些糟粕或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予以批判。

徐小洲

1998年10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徐小洲
导 言	霍华德·李·诺斯特兰德
第一章 温和的改革精神	33
第二章 基本问题	45
第三章 教育的经济原理	65
第四章 大学的基本功能:大学、专业和科学	73
第五章 文化和科学	81
第六章 大学的“附加”功能	95

导 言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普通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对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可以充满信心。普通教育除了专业训练的内容外,还指人的全方位的培养过程。它包括生活目标的文明化、情感反应的完善化和依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水平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等内容。

从这种意义上说,普通教育是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当然,要实现人类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其他许多问题也必须解决,如国际组织问题、民主控制问题、经济合作问题和人的自由问题等等。然而,对于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它们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像美国这样对决定善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和支持,那么我们就能够实施最好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有许多有关普通教育的论著问世。其中,绝大多数的著述为进行有益的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有的也因为为我们的改革提供了更多的思路而受到欢迎。但是,只有少量著作清晰明了地阐明了我们希望实现的更加宏伟的蓝图。这是一项可以促使我们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彻底解决现代社会根本问题的使命。西班牙思想家奥尔托加·加塞特所著的《大学的使命》就是这类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一

本。事实证明,这本书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勇敢、最有力的一大贡献,因为它触及了上述问题的要害。

就问题的核心而言,似乎是事关现代世界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目的是否一致的问题。个人目的固然极其重要,但是,他们对目标的选择必须具有共同性,能为文明社会的实现创造一些条件。其实,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越来越强烈,个人也只有完全依赖于文明社会才能获得幸福、安宁的生活。我们所作出的选择越来越多地在他人和其他国家之间激起强烈的反应,如作出的选择是引发还是扼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苗头等。我们需做的是要争取对这类意义深远的选择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普遍共识。如今,任何由“主人族”或由一群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专家强加于我们的共识是绝对没有用的,因为这种共识与我们从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和人类心理学所获取的知识精髓相违背。由于共识必须是自愿达成的,那么,如果我们在作出最佳选择的基础上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话,自愿性质的共识又如何达成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临的困难通常并不是因为一些最终目标的意见分歧,如免于病患、实现自我理想和人人自由平等等,而是关于究竟何种选择会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何种选择最有效的问题。因此,自愿达成的共识必须建立在对自然和社会条件共同理解的基础上,而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力图将我们的目标付诸实施。如果有人反对说,我们面临的困难并不是自私而是无知,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狭隘的、危害社会的目标仅仅是无知而造成的间接的、次要的结论。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狭隘的目标是行不通的,甚至利己主义的目标也是行不通的。

显然,在我们周围,共同理解太少了,现成解决问题的办

法也无处可寻。各种处于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的人们难以达成共识,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领域内,接受各种不同训练的人都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在相同的认识水平上共同探讨下一阶段切实可行的方法。现代知识并未使这种共同理解变得容易。事实上,它几乎是在向人类的智能挑战。这不仅是因为知识不断飞速发展的结果,还因为在过去的几个连续时期内,人们对知识已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诠释。自相矛盾的诠释留存于当今世界,并进一步加剧了我们认识上的混乱。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人类对这种难解的分歧作出的最常见的反应是试图避免挑战,而不是作出任何全面理解它的尝试。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文明的公民,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回避了我们应承担的多方面的责任。在过去 20 年里,在我们作出的一些重要的选择中,我们在逃避探求下一步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水平,我们的所作所为,不像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只是“芸芸众生”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奥尔托加表现出无穷的才智。1929 年,他出版了《群众的反抗》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剖析。接着,他又继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1930 年,他完成了这项研究,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时经济大萧条还未来临,奥尔托加的著作促使人们从整个文明潜在的文化失调中去寻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只是现在受到第三次动荡的触动,我们的普通教育运动才开始去洞察和了解这个问题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疑难点。目前这些片面、局部的观点如何能够加以综合,构成具有某种共识的、既稳定又在逐渐发展的基础呢?如何能够在未削弱旨在为真正自由服务的综合体系下传授这种知识呢?

美国普通教育运动所取得的进步非常显著,这不仅表现在教育技术、指导、概论课等各门课程的整合方面,甚至在普通课程方面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成就并不等于人们所要求的全面一体化。尽管我们已提出了一切可能的反对意见,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一种非现实的乐观主义精神来发展技术。在自动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打破自己的信念,从而使我们能够奋力解决 15 年前曾令奥尔托加忧虑的那些基本问题。因此,我们国家那些勇敢、讲究实际的先驱者们在追溯浩瀚的历史时,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富于想像力的西班牙探索者的足迹。

作者极其复杂的生活和思想背景,使这本简略的小册子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即使撇开这一点,导言只要提及本书的重要性和及时性也足以引人注目。当然,在一个想像的背景中展示本书的思想概要会出现许多谬误,尤其是有人觉得这些谬误是正确、大胆的时候,更容易误导。

奥尔托加一生经历复杂,他从事过的职业不少于五种。他曾经是教师、作家、出版商兼编辑、哲学家和政治家。他的生活因动荡混乱的历史环境和一系列千丝万缕的偶然事件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一些,以便作出最合适的评价。但是,并非所有论及此事的作者都持谨慎的态度。此外,本导言还将省略大量的内容,以筛选出最能阐明奥尔托加文化教育理论的思想观点。

奥尔托加的 1883 年出生之日起到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的这段经历,我们幸运地可以参照埃莱娜·韦尔所写的关于奥尔托加的传略。这份传略写得很不错。埃莱娜·韦尔(Helence Weyl)女士曾担任过奥尔托加的翻译,对他非常熟

悉。该传略可以从 1937 年 7 月的《多伦多大学季刊》第 461—479 页中找到。至于奥尔托加 1936 年以后的年月,世人或许得等上好几年才能读到一本权威性的传记。不过,要详述奥尔托加在这期间的主要经历还是非常容易的。奥尔托加少年时代的朋友、著名的哥伦比亚目录学家费德里科·德·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教授,在 1943 年 8 月的一封信中已为我们作了措辞亲切的概述。奥尔托加离开西班牙时,已患了不治之症。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不久,他去巴黎做手术,接着又去荷兰休养,然后去了葡萄牙。另外,他还去阿根廷呆了一段时间。1942 年,他决定返回西班牙。

然而,最重要的并不是有关奥尔托加生平的叙述,而是有关他生平的解释。1936 年以后,他变得越发难以捉摸。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原因。奥尔托加自己在此期间由于病魔缠身,变得少言寡语,发表的言论相对要少得多,所以新闻界一度反应激烈的态度也变得比以前更难捉摸。这不仅仅是因为新闻界可能抱有偏见,而且也可能是对奥尔托加原先的言论缺乏正确的认识的缘故。这一点,就有关奥尔托加最后一次西半球之行的资料来看,是确凿无疑的。所有激烈言辞的深层解释,必须要等一些头脑非常冷静的历史学家来作深思熟虑的分析。

尽管如此,这最后 8 年时间里的生活背景对《大学的使命》一书的创作,相对而言不那么重要,而在此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大约从 1910 年到 1936 年的 25 年时间的背景情况。在那些年里,奥尔托加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述他自己绵绵不断的思想,因而他已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完整的记录。但是,评论家们对此显得难以达成某种一致的评价。为什么对奥尔托加的

评价会如此褒贬不一,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则激烈的贬低,而持中间立场的人士却相对稀少呢?事实上,与奥尔托加相比,我们的专业面要狭窄得多,因此,我们往往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奥尔托加广泛活动中的某一个方面上。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人们对他的每一项活动的评价为何各持己见的原因。根本性的解释似乎更是一个事关情感,而非事关理智的问题。实际上,让奥尔托加的同代人来客观、公正地评价他是不可能的。奥尔托加充满激情的个性,以及他与我们自身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热点问题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使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就他本人而言,他所从事过的职业以及由此在他身上所形成的特点也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就造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戏剧性局面。而当他在这种现代思想意识的唱独角戏似的局面中支持或袒护一方时,读者们就会丧失一切公正的精神。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如果不是当教师的本能令奥尔托加易于纠正所遇到的种种错误想法的话,他那出色的口才和广泛接触公众的活动,本来或许能够自然地使他成为新闻记者行列中的典型代表人物。正是出于同样的教师性格的原因,再加上他本人强烈的社会意识,导致了这两方面因素的互相作用。这种情况甚至使他在教学生涯中也引发了许多摩擦。由于他对思想所造成的现实结果具有非常敏锐的意识,所以他永远也不会满足于把社会伦理学仅仅当做纯理论来教授。再者,奥尔托加是一位无可争议的老练的政治人物,但在政治生涯中他性喜教育别人的特点使他根本不可能和他的政敌达成平和圆滑的妥协,也不可能容他采取权宜之计受其追随者的左右。

作为一名哲学家,如果不是出于对涉及多方面的、与任何党派思想不符的真理的忠诚,他所从事过的这些职业也许还不会如此互相冲突。奥尔托加在政治上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但他也是一位对错综复杂的遗产中最值得保护的东西持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物。因此,他对左派和右派人物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左右两派则分别以他的批评为把柄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试验地,使之成为发动下一场世界大战的工具。他谴责国内的领导人,甚至还谴责了外国人,因为正如他所耳闻目睹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舆论入侵西班牙,而全然不顾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民真正需要什么。共产主义和法西斯都被植入了西班牙人的思想中,它们仅仅掩盖了存在的问题,并延误了问题的解决。从以后的历史来看,他的观点似乎反映了极大的真实性,尽管他的那些观点在当时令左派人物和反动分子不快。

在漫长的公务活动生涯中,奥尔托加身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敏锐的分析能力和敢于指出同代人错误作风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这两种个性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往往会产生碰撞。他抨击当权者滥用权力,以及揭露“群众”在争取真正民主方面的无能而令那些声援社会的人或政治受害者感到不安。他由此推断出,现代社会需要由知识界杰出人物来领导。显然,知识分子本身从最佳意义上说,是头脑谨慎、思想独立的智者,他们对正从事实际工作的反知识分子者——极权主义者——避而远之。但是,奥尔托加又不时地冒犯他的知识分子同行。他经常谴责说:“浮夸和不负责任是欧洲‘知识分

子’常见的恶习,我认为这些是造成目前混乱局面最重要的因素之一。”^①

这些是为什么迄今人们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奥尔托加的原因。如果他超脱党派和专业界限,那么他可以这样做——揭露许多不同思想信条中存在的不足和缺点,因为绝大多数批评过他的评论家必定是这些信条的倡导者。

此外,奥尔托加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也令他本人难以成为一名墨守成规的人。但是,即使他自己脑子里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复杂的想法,他也善于激发普通读者跟着他的思路积极思考。基于这个目的,他所采用的修辞式雄辩手法有时使成熟老练的批评家感到恼火——如通过对术语进行重新定义而解决突出矛盾的手法,或是采用像“群众”——经济人的遗腹兄弟——这样虚构、假象性人物的词汇,或是运用一些与基本思想路线无关的戏剧性表现形式——工于藻饰,善于把握读者假定的固执的个性等。所以,我认为,在所有这些修辞手法造成的负面效果的影响下,那些有知识的优秀批评家容易对奥尔托加产生错误判断。《现代题材》一书首次在美国出版的时候,亨利·哈兹利特是纽约《民族》周刊的文学编辑。他于1933年借此机会对一年前《群众的反抗》一书受到过度的赞扬表示感到惊讶,进而断定奥尔托加不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而是一位“修辞学家式的思想家”。事实上,这好像与把他看做既是一位修辞学家又是一位思想家的评价同出一辙。

《群众的反抗》一书在措辞表达和说服力方面是非常成功

^① 奥尔托加·加塞特:《论和平主义》,见《十九世纪》,1938年7月第124期,第32页。——译者注

的。因而,在过去十年里,这本书在美国许多公共图书馆成为试图使普通公民相信自己文化无能的那类书籍中读者面最广的一本书。该书最大限度地赢得了支持普通教育运动的公众的赞赏。作为新闻记者的奥尔托加对需求戏剧夸张性思想或观点的广大公众具有敏锐的判断能力,所以他会说服撰稿人紧扣国内的主要问题不放,而不是去做细微的区分和评论任何一种谨慎的主张。

从另一方面看,《群众的反抗》一书不只是引起了那些不作任何评论的读者的注意。美国教育家乔治·埃德加·文森特、诺曼·福斯特、罗伯特·谢弗和亨利·M·里斯顿等人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都对此书表示赞赏。本书的基本思路不仅多次被思想家认可,而且也被以后的历史所确认。当然,不幸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整整十年时间是一个人性价值和开明思想倒退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人性价值和开明思想不仅没有得到强有力的保护,相反,遭到了那些受粗俗理想教育的天才人物们肆意的歪曲和讥讽。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奥尔托加视为一名思想家。这是因为作为新闻记者的奥尔托加善于运用炫耀表现的写作风格;作为政治人物他又能够唤起我们的党派情绪。如果说由于他所从事过的几项职业的冲突而使他难以作出冷静的评论的话,那么或许他丰富的经历可使他具有某些较深刻的见解和洞察力,而这对于那些生活观念较狭窄的人来说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在教育界还有某种特殊的原因,那就是指望能从像奥尔托加那样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中找到某些富有成效的思想。如今,很少有思想家能够大胆地深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更广泛的领域,他们更像是个毫无经验、未受过训练的业余

者。所以,我们抱着期望和谦逊的态度来看待这位特别的思想家是恰当的。他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已涉及到了世界各地。

其他的现代哲学家几乎很少能够像奥尔托加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共和国时期那样,发挥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主导作用,或许一个都没有。事实上,他已开始被他的许多同胞誉为“共和国之父”。1931 年,独裁者普里·德里维拉统治时期,奥尔托加联合许多西班牙知识分子组建了“共和国服务协会”。此举使他进入政治舞台,因为他作为协会的代表被选为立宪议会议员,他由此增长了不少宝贵的见识,了解了诸如公共事务、执政管理程序的可行性和局限以及政治领导权的本质等。

这种见识使他原本作为一名报刊业主和新闻记者丰富多彩的阅历更加充实。他创办并主编过举世闻名的《西方杂志》月刊,还帮助创办了同样享有全球性声誉的《太阳报》和爱斯帕沙—卡尔帕(Espasa - Calpe)出版公司。作为一名论说文作家,他以深刻、令人喜爱的思想观点吸引了公众们的广泛兴趣。他的思想观点起初通常是从我们每天的日常体验和感受着手,引导读者认识关于革命的某种意义重大、丰富的思想,这些文章都被收入在题为《旁观者》的系列文集中。此外,他还成功地说服普通公众去阅读他的充满雄心壮志的文章。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群众的反抗》和《现代题材》两本著作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奥尔托加深知普通群众对教育机构忽视与外界社会的依赖关系深恶痛绝。因此,他在《大学的使命》的第 37—38 页、第 40 页以及第 76—78 页上作了一些解释,以免引起误解,防止有人可能从本书中得出任何草率的结论。尽管如此,本书

的一些读者仍然不能信服。他们认为,奥尔托加似乎完全把文化视为一条在崇高的大学中兴起,然后流经平原和沼泽地的一条河流。不过,可以断言,由于他的社会意识非常强,在构筑本书的框架结构时,他已想到了本书将会对有组织的严谨的大学知识与人类在生活中所学到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尽管奥尔托加撰写本书的素材只是些供自己使用而写的笔记,但是,它包含了一个事实:文章实实在在地触及了其他人肯定也会提出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要求我们发挥双重的想像力。首先,是什么使他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便条上草草记下这些特别的论题和零碎的片言只语?他为何要以这样的顺序来安排和组织他的字句?其次,就他未提及的影响和后果而言,他是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呢,还是根本未加考虑?或许我们解决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其简洁扼要的文章中找到能够弥补的内容。无论如何我们在详尽、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过程中看到了一个辛勤耕耘、才智出众的人物。

奥尔托加漫长的教师生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经过数年悠闲的学习和准备工作——主要是在西班牙和德国,他于1911年被聘为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任职长达20年。期间,他有一次因抗议独裁统治侵犯学术自由而辞职。他是一位深具号召力的教师,当他发现大学教室里的气氛过于混乱,不利于学习知识而转向校外时,他的学生甘愿在太学校门之外追随着他。

奥尔托加在教学方面取得的出色成就,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他善于从日常生活经历入手,正如他在《旁观者》文

集中所采用的手法一样,从日常体验中得出一个具有崭新意义的普遍原理。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德海一样,奥尔托加深谙把抽象和具体相结合的“用想像力充实知识”的艺术;另外,他和怀德海的共同之处是惯于“既追求简单性但又表示怀疑”。因此,虽然他主张年轻人应该学习前人系统阐述过的一整套思想概念体系,但是,如果因此简单地认为他们通过死记硬背那些表述真理的术语就已经掌握了学习的过程,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综合在教学中的作用,只是使教师更有责任地对我们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知识精髓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更加有效地促使学生发现问题和得出自己的可靠的观点。

作为一名教师,奥尔托加的另一突出特点也同样证实了这个看法,那就是他是如何使一个综合体系成为学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的。他毕竟是位重视个性发展的教师。非常有趣的是,在过去七年里,我询问了所遇见的几位奥尔托加的学生,他们都提到,奥尔托加最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进行小组讨论。他让学生们自行进行调查研究,不过他对学生研究结果的评价非常苛刻。他并不要求任何人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但是,他激发学生尽力在力量、知识等方面超越自我。他们在回忆奥尔托加的教学情况时,都感到奥尔托加使他们自身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而没有丝毫丧失。与其说他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引导学生们如何丰富自己的个性,还不如说他更想让学生们能够发挥自身的潜能。奥尔托加的做法无疑表明,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指导的个性自我发展,是任何优秀的教育机构最重要的活动。

因此,作为教师,奥尔托加与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并不一

样。读了《大学的使命》这本书就可以推断出这一点。^①奥尔托加的理论并不是对他的实践的描述,而是对实践的一个补充。就奥尔托加本人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并不是处在一个要把多方面的理论付诸实践的位置上。他十分赞同教育必须个性化的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的所有人员都应该有机会享受这种教育,而且,教育的内容必须是所有学术领域的知识精华。至于教育个性化这项计划的第一部分,他能够自己来实施;然而对于其他部分——机会的推广、普及和综合,需要公众、官员和诸多学术领域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们的合作。但就他所处的一代人而言,无论是公众、官员还是专家,都尚未做好使这项计划发挥充分作用的准备。

难道奥尔托加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做法是与其文化综合理论相矛盾的吗?回答似乎是否定的。显然,个性化教育并非要替代合理社会意识标准的制订,学习机会的推广和普及也不是如此,所有这三者都是必须的。

奥尔托加从特殊、具体事例着手的方法,是他的实践过程中的另一基本组成部分。但它似乎难以与其综合的思想相合拍。然而,事实上,综合的必要性恰恰是由此而生的。设想一下,假使你们决定和奥尔托加一起只是共同概括确定的、具体的经验,并从这些经验感受着手,全面考虑那些足以综合指导

^① 相反,在早些时候写的《生物学与教育学》(圣何塞—德哥斯达黎加,J·加西亚·蒙赫,1923年,第77页)一书中,奥尔托加似乎是一位注重个性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因为写该书的目的是反对要求小学生必须读《堂吉诃德》的规定。奥尔托加的反根据在于,他认为这项要求是与儿童个人的成长教育不相符的。多米尼哥·卡萨诺瓦斯先生对《生物学与教育学》作过一个精辟的概述。见《教育》(卡拉卡斯,委内瑞拉),1940年第5—6月刊,第26—28页。——译者注

你们生活的普遍原理,那么情况将会怎样?你立刻就会发现现代思想中存在的争论不休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确实有效的出发点,一种不能减弱的知觉?我们的推理涉及了什么样的假设,而那些假设从文化角度看相互之间又有何差异?我们的人性推理被认为是像一个有机体适应其所处环境的过程之一,它具有什么样的固有的缺陷?除了那些我们内在固有的因素之外,外面的世界对我们系统地阐述真理又会有什么样的限制?被称为“价值观念”的普遍原理是什么?我们依据价值观念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么,价值观念和确立价值观念的方法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保持和谐一致?此外,理性地说,我们在那些还没有形成理性结论的生活领域里应该怎么做?

就这些基本问题而言,如果形形色式的个人和文化会对共同合作的内容,对我们可能获得的物理和生物知识,以及对在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够被合理选用、并能付诸实施的选择性方法达成共识,那么仅有个人意见是不够的。思想观念比奥尔托加更片面、狭窄的专家可能会认为某一个领域对他的教育启蒙是不重要的。奥尔托加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许多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甚至是在某一知识领域不受限制的科学结论尚未应用于生活之前,其他领域的关系和意义也必须纳入被称做哲学或宗教的综合参考标准的考虑范围之内。

因此,奥尔托加关于综合体系是必须的理论,不仅仅只是作为补充,也是源自于实践的必然结果。

现代生命知识的综合体将会是渐进的,或者说是动态的。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再是静止的,只是前后的观点、思想部

分地保持一致。综合体会包含一些论点,还有许多未决的问题。我们只能以严肃、认真的精神来对待它,任何想对其进行描述的企图都只是满足它为某一目的服务的要求——正如一种对天空的描述那样,或多或少属于有点任意以某些观点为中心而展开的简化了的、有组织条理的说明,它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天文学,但是永远不能期望由此可以完整地或决定性地描述整个复杂的真理。

奥尔托加非常清楚现代综合体的这些局限。事实上,他要比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更加远离那种古老的思想——通过理论推定,概括出现实存在的绝对事实和普遍事实的普遍原理。除了擅长研究西班牙文化之外,奥尔托加的卓越才能还表现在他对人类文化复杂的演化发展具有深刻、敏锐的见解,对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念的重要性方面也具独到的诠释。

对奥尔托加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柏林大学的一位哲学家。奥尔托加称他是“19世纪后50年里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①显然,奥尔托加忽视了尼采(Nietzsche)。尼采的知名度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曾利用其思想起鼓动作用的纳粹德国,都要比狄尔泰高得多。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我们美国的思想史学家也加入奥尔托加的行列,把狄尔泰视做这个知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狄尔泰曾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由于三方面的情况同时发生的缘故。第一,在时间上他未能完成一个项目。其原因与帕斯卡尔(Pascal)一样——他那永不满足的想像力始终驱使他去探索问题的新领域,而他脑子里的思想却在变成

^① 见《走向历史的哲学》,1941年,第216页。——译者注

文字之前就似乎已过时陈旧了。

第二,狄尔泰的不幸之处是在文德尔班(Windelbald)、李凯尔特(Rickert)和特劳茨(Troeltsch)等第二代解释者对他思想的诠释上。由于缺乏像奥尔托加一样敏锐的洞察力,他们僵化了他的哲学理论,使之完全沦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事实上,狄尔泰恰恰相反,他曾试图设想出一种世界观的比较结构,设法揭示各种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和相同之处,以及它们的内在组织结构和多线性特殊进化的奥秘;而且,只要不是幼稚地按照其中某一世界观固有的价值观念来评判它们的话,最终就可找到能够用来比较它们之间优缺点的基础。他认为,把我们自己的文明视为静止的和最终的文明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人性预期会在无数的变异过程中得到进化,人类就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文明,对高级人性的认识和领悟会出现想像不到的情况。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狄尔泰的著述,而不是去看对他的思想的较为简单容易的解释说明,我们就会发现狄尔泰身上所具有的不容置疑的高贵品质和对我们至今仍需面对的问题的关注。

狄尔泰的第三个不幸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舆论环境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环境曲解了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思想中,而且也表现在奥尔托加这位杰出的西班牙思想家对他的哲学思想的诠释之中。绝大多数19世纪晚期的自然科学哲学家都顺应了实证论的倾向,先是否认科学和价值观之间存在的任何联系,然后是更加走向极端,甚至根本不承认科学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任何关联。这种孤立自然科学的简单做法引起了当时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反对。与其公开承认形而上学的立场,他们宁愿把他们的科学

臆断为就是一场描述和排列感觉印象的游戏。

在怀特海和其他流派思想家的抨击下,这种实证主义方法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基础,一些实证论者在探索自己的观点、立场时也认为实证论的思想难以维持下去。例如,埃弗里特·纳尔逊(Everett Nelson)教授就似乎推翻了前辈们的假设:即使我们除了感觉材料之外一无所有,我们仍能够作出预言,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仿佛是和现实世界在打交道那样。如果这种假定有疑问,那么纯实证主义的思想会失去许多拥护者,因为我们确信无疑的是有效地运用了我们认识物质世界获得的知识,来为作出预言之目的服务,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理论和学识相抵触。如今,把科学仅仅视做一场罗列、整理感觉印象的游戏的观点和立场似乎难以站住脚。不过狄尔泰和许多同代人都承认这观点是最不过分的假设。奥尔托加在1932年也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①他说,“如今我们已开始认识到物理学是一个思想的综合体,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物理学使我们接触非超验的思想”,“物理学中真实存在的——不是纯粹的思想——只是它的效用,那就是为何我们对物理学不再感到害怕的原因,因为担心、害怕我们才会持敬重态度,而因为敬重我们才会持热情态度”。

这种舆论环境使得狄尔泰以及追随其思想的奥尔托加,试图从科学的荒谬困境中拯救出一些实践知识。显然,如果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推断力也同样应该得到证明,正如物理学家表面所显现的远离现实那样,那么我们就必须调整奥尔托加的物理观——尽管他已作出过调整,必须放弃对所有知识

^① 下列引文出自《走向历史的哲学》,1941年,第229页。——译者注

和合理方法抱有的尊重和热情的态度；知识也不再是一种力量，人类也不会想努力成为一种理性的动物，人性就会屈服于一种新的力量，屈服于一种新的动物，而这正好是在一个新的世界即将开始的时候。由于知识经历了一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和精炼，这个新世界或许本可以成为一个富足安康的世界。

狄尔泰认为，这样的归谬法是不需要的，因为在科学和另一种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本质的区别，他把这种有关人类精神的知识称为“人文科学”。^①他在两种知识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并把这种相应合成的二元论作为他哲学基本思想的基础。狄尔泰的思想特点与其长时间的隐没是否有关系，关系如何，这很难说。目前对他的思想所具有的影响力可能是评价过高了。至此，我们不禁联想到奥尔托加也没有摆脱这种两分法，因为奥尔托加在他的《历史是一种体系》一文中把“历史理性”与“科学理性”区别开来。问题在于，狄尔泰难以被人理解的哲学思想不仅一直阻碍狄尔泰本人进步，而且也是阻碍他的那些不是那么杰出的追随者们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除了狄尔泰留下的文献财富之外，这种背景对客观公正评价奥尔托加的哲学思想有什么意义呢？第一，狄尔泰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形成奥尔托加文化综合体系思想的关键内容；第二，他的二元论思想分离和削弱了综合

^① 狄尔泰所指的含义与历史和评论大体相符。约瑟夫·科恩教授称之为“解释性人文科学”，以区别于“创造性人文科学”。狄尔泰特别强调解释对某种感情移入经验的依赖性。——译者注

体。但是,狄尔泰最后分析研究并传给其杰出的继承者的并不是一种静态的二元论,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综合体,它处于一种逐渐包含更多内容的进化状态之中。

因此,狄尔泰认为,下述的区别是毋庸置疑的:自然学科试图在有限的参考标准内描述相互间的关系,而人文学科则试图在以我们整个人生观为参考标准的范围内综合各种意义。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包括生活理想、生活目的和实际决策等方面。如今,如果不采用怀特海较新的提法,那就难以来表述这种洞察力,但从本质上说这也是狄尔泰的思想。就科学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而言,它现在仍是我们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而且它还提出了科学家和其他零散的现代思想流派代表人物之间存在的一个理解差异的问题。

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明显存在的二元论,不利于我们的文明的综合。我们需要用一种理性的方法,去解决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问题。甚至是在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化内部,随着它的加速进化,冲突就会产生,而冲突的解决只能依靠某种令人信服的具有共性的东西,也就是不同民族间理性的合作基础。然而,狄尔泰的二元论思想则恰恰相反,它主张目的和手段之间要有鲜明的区别,就像帕累托(Pareto)这样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在能够理性地选择手段时,目的只能被包含在一种盲目野蛮的行为方式内;但这种行为方式不容许理性选择,不容许出现差别,不容许发生冲突的不同意识形态间出现平和的妥协。法西斯主义有害的非理性思想,实际上存在于运用强有力的理性手段去实现无耻的非理性目的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是去实现只能够为某种特殊理性辩护的、不同于科学理性

的目的。法西斯主义二元论的基础在很久以前就已奠定了，这部分是由于自文艺复兴以来绝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对科学既让人遗憾又缺乏想像力的敌视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我们宗教传统中的某些因素起作用的结果。19世纪晚期，由于柏格森(Bergson)、狄尔泰、保罗·埃尔默·莫尔(Paul Elmer More)等人对当时肤浅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态度作出了相对抗的反应，思想领域出现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与此同时，我们对界定知识的假定分界线了解得越多，就越不可能划分出它们互相关联的学科内容的自然界限。事实上，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意义关系，乃至技术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关系，看来似乎都是我们最有希望的资源。同样，我们越是研究自己的心理过程，我们就越能发现我们的基本心理模式是延续、不可分割的。从数学到生物学，从生物学到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以及创造性艺术，我们都发现同样的综合过程，集观察、创造性想像力以及为作出更好选择不断剔除错误思想和有缺陷技术工艺而展开的符合逻辑、缜密严格的研究于一体。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和它似乎要取代的实证主义概念一样，20世纪有机统一的宇宙概念是暂时的。不过，有机体概念^①确实不需要狄尔泰的超验二元论思想，这样就为我们能够正确评价他真正伟大的贡献扫除障碍。他的贡献在于使我们能够把握科学在我们的文明中的地位。

在最后的研究工作中，狄尔泰在文化综合问题上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狄尔泰之前，布尔克哈特(Burckhardt)

^① 李约瑟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观点也有简要的说明，见希尔普编的《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哲学》，1941年版，第256页。——译者注

已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但布尔克哈特由于过于把自己局限在当时的艺术表现形式上,结果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而狄尔泰却解决了那些困难,他通过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广泛的因果关系。因此,他传给后人的综合体概念是一个正在扩展的概念,其内部存在着更加包罗万象的发展势头。奥尔托加具有超人的才智和能力,他能够从历史角度出发,一直追溯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教育问题来拓展这条原理。如果造成综合理论分裂的思想分歧在此其间已变得无关紧要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比奥尔托加所盼望的那样还要幸运。

除了和狄尔泰在学术观点上有相似之处和密切联系之外,奥尔托加和他那代人中的循环论历史学家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20世纪所有伟大的历史哲学家都采纳了同一个理论观点:历史是以较大周期往复运动的,是按预期顺序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循环,如同赋有节奏一般。与施本格勒(Spengler)、索罗金(Sorokin)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nold Toynbee)等人一样,奥尔托加看到了历史具有一定形态以及文化具有成熟期和变弱期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他赞同他们对当前形势所作的悲观的分析,赞同他们对人不仅主要是理性动物而且也是情感动物这一事实所具有的深刻认识。事实上,奥尔托加的早期著作《现代题材》就是以这个思想为出发点的。在《群众的反抗》一书中,奥尔托加着重论述了人类本性中情感的一面。该书的主要建设性思想是第十四章。在这一章里,他期望把某种振奋人心的社会目的作为使当今每个人团结起来的惟一力量,建立起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即使在《群众的反抗》一书中,奥尔托加也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更不是宿命论者。无论是与施本格勒的“新

专制独裁主义”、索罗金的感性野蛮状态,还是汤因比预料过的宗教狂热浪潮(如果我们可以根据他著名的题为《历史研究》的十二卷书作出这样的判断的话)相比,在奥尔托加眼里即使人民受到了自己情感的引导和影响,一个由人民管理、具有高度目的性的社会,它的未来前景将会是和睦友好的。在《大学的使命》一书中,奥尔托加进一步摒弃了那些险恶的观点,并且否定了循环论中众多反理性的思想。他并未忽略一年前曾是《群众的反抗》一书主要论点的情感因素,而只是将注意力转移至一个建设性问题上: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能够选择和支持最佳情感反应、最佳目的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做出的最佳决定。他的假设取决于我们运用自己理性的情况,这就是促使他为何把多风波的现代世界的研究问题带入安静的大学校园内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处于社会的这个部门,而是因为大学是西方才智生活的化身。领导的责任落到大学的头上,要经历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是有效改革普通教育的先决条件:第一,要综合我们文化的精髓部分;第二,要使这种文明生活的基础成为一种永久的影响力,体现在现代生活的形形色色之中。

奥尔托加承认,我们不能保证取得成功。这种态度是他“严肃的改革精神”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因为在我们当中,即使是最宿命论的思想似乎也赞同努力总比不努力好的观点,甚至我们处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也是如此。然而,为了表明他的建设性意见,奥尔托加的探索大大脱离了这个基本的一致性观点。他的见解可能是与我们希望留传给年轻一代的世界观相一致的,但这是否可以相信呢?还是我们要相信自以为明智,实际上却又是带有偏见的判

断呢？

有几个原因似乎可以说明奥尔托加为何偏离了其他循环论历史学家的预先推论的思想，这几个原因还蕴含着一个可能性：或许他毕竟比其他人具有更加深邃的洞察力。

第一，他极其丰富、广泛的经历为他在探讨普通情感倾向这个无法估量但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现代社会自然形成的各种行业性观点中，历史学家们对此持极端悲观主义的立场，或许只是银行家们会对这种立场提出异议；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它则肯定受到社会设计者和改革者，及其最密切的第二个群体——工程师的欢迎。作为对其群体态度的科学研究，不可忽略或回避这一设想。它揭示着含义深刻的真谛，因为它促使人们深思：既然奥尔托加的思想背景包括极端传统的两个方面，那么他的视野和观点是否可能反倒不如那些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思想家那么难以取得平衡。

奥尔托加积极的一生使得他能够和人们进行广泛的直接接触。它因此克服了一种无知的现象，这种无知正是大多数学术悲观主义思想的重要支柱。他通过文章和自己的政治活动与人民接触。通过这些，他了解到许多教授如今正在通过参加一些我们如何发展成人教育的社区讨论会和委员会等活动来获取认识。也就是说，大多数公众并非像他在自己与外界隔绝的臆想中那样缺少思维、缺乏想像力、目光短浅和不负责任，或没有审美观。

第二，由于受狄尔泰的影响，奥尔托加在方法上和别的循环论历史学家有着很大的区别。施本格勒和汤因比以及其他诸多知名度相对较低的人物，主要关心的是可以从不同的历

史文明中发现文化类比的问题。他们一直尝试描绘文化的兴衰,通过归纳绘出一条综合、图式化的曲线。他们在预言未来时,明显受到这条理论曲线的轨迹的引导。他们把我们自己的文明曲线置于理论性曲线上,并在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上标定点,然后悲观地推断出表示衰退的下降线。从另一方面讲,奥尔托加通过深思熟虑和分析研究,尤其注重系统地去领会我们自己现在的文明的含义。在奥尔托加众多的研究论文中,阐述这种看法的是《艺术的非人性化》(*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一文。这篇文章可从雷德(Rader)编著的《现代美学》(*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35年*)一书中找到。

因此,奥尔托加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之处留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当然是就其进化的背景而言——而施本格勒和汤因比则倾向于不那么注重那些预期可能会使我们的文明远远偏离正常曲线的独特因素。或许奥尔托加忽视了一个最清楚的历史教训。但从另一方面看,完全依赖于对一条理论性曲线的推断难道不是轻率鲁莽之举吗?这甚至在工程学领域也是一种非常靠不住的预测手段。

奥尔托加的思想事实上可能不是那么不切实际。施本格勒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他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彼此隔绝、互不理解、独立运动的。但是,他的观点并非是对现实依据的惟一解释。汤因比作过更加详尽的研究,他更倾向于认为,一种文明和下一种文明之间具有很大的连续性,而且少数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在我们目前这个时代能够对今后一个时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即使今后这个时期是一种新的文明的开始。奥尔托加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也采用了同样的观点。他

对青年听众们说,他们作为“一个处于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可以被视做能够引起西班牙社会重组的一种力量。从这里我们认识到,早些时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本来是可以受到那些总是迫切渴望进行社会改革的诚实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欢迎的。

可以说,如果狄尔泰使奥尔托加不至于过分相信新发现的曲线,那么,他一定是有效地告诫了他不要过于专一地把美学看做解释我们整个文明的思想观点——虽然事实上以他自己广泛的兴趣,几乎不会令他陷于布尔克哈特的错误之中。然而,似乎正是这个错误损害了索罗金对现在的解释和对未来的预言。另外,这样的评价对有些人也同样适用,这些人把普鲁斯特(Proust)的思想看做对西方世界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最后总结。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普鲁斯特造诣颇深的部分综合的思想,并未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生机勃勃的社会运动,而现在那些社会运动似乎最可能成为形成未来历史的因素。

所以,与索罗金、施本格勒和汤因比重点突出的观点相比,奥尔托加在采用狄尔泰注重的“感情移入”观点时可能经过更为周密的考虑。

奥尔托加的建设性思想——文化综合性的思想——极具独创性,这更大程度上是他努力探索我们现代文明的结果,并不是像相信宿命论那样预言文明曲线的下降而提出的。他在认真思索自己亲眼所见的幸福和痛苦现状时,逐渐意识到了我们的文明中存在的善和恶的成分。这种认识本身本不会使他的观点有别于施本格勒或索罗金。施本格勒和索罗金的价值判断观,是以大量的像“西方衰退”和“感知文明”这样的措

辞为根据的,甚至我们当中那些为没有价值观而悲叹的人实际上也是间接地背叛了我们的假设——另一种事态可能会好些——如果它不是一个价值标准,那么更好的依据是什么呢?不过,奥尔托加则比较慎重地把他的价值判断观建立在一个积极的、“处在时代盛时”的人生观之中,并且充满自信地把那些给现代世界这种积极的理想带来不利影响的事物确定为不好的成分。由此可见,虽然《群众的反抗》一书的书名是反抗的意思,但是根据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赋予的最佳知识水平,对于那些反对在现代社会中担负起重大责任的普通人来说,它实际上却是更接近于被动逃避的含义,而不是反抗的意思。

毫无疑问,奥尔托加会很快承认他有关优秀的思想观点是“过时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舆论环境的不断变化所留有的印象都不如他深刻。从另一方面看,他可能指出,这种过时的具体论述对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思想是需要的,而且在具体论述的背后,人们会在整个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中,发现最永恒的两个互相依存的价值观:个人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定会遵守价值判断观。如果说这一论点论据充分的话,那么,奥尔托加选择和确定一个积极肯定的态度,与否认客观现实是一种价值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和客观崇拜相比,并非是幼稚可笑的。

奥尔托加的理想大学观要比他的理想社会观“过时”得多。后者必须根据人类持续不断的需求和渴望行事,而大学则被视为克服现代社会某一具体缺陷的一种补救办法。我们不会把奥尔托加与那些要求大学恢复到13世纪时的样子的人相提并论。那些人认为,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会恢复与那个时代联结起来的文化统一。奥尔托加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因而他不会忽视中世纪大学兴旺发达时期的一个事实：古典文学的教学处于衰退状态；尽管所有大学都有法学系，多数大学有医学系，但有神学教师教授基本原理的大学不到一半。此外，就奥尔托加积极、敏捷的辩论方式而言，他也是一位非常谦虚的学者，因而他不会声称自己找到了对任何时期都适用的大学模式。

奥尔托加建设性的观点确实促使他作出了一个有疑问的假设，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类具有足够的理性摒弃一个不是那么站得住脚的想法，而去寻找一个更合理的思想，^①尽管宿命论者对此都设法避免。除非这个假设是真实的，否则大学想让公众相信任何开明的思想的努力都只会是白费心机。

这个假设显然是奥尔托加论据中的一个弱点。他自己在《群众的反抗》一书的第八章中明确地贬低了理性观点的力量，他对反抗的“大众人”迫切要求正义和理性进行了严厉的指责。^②但从另一方面看，一切高于动物训练层次的教育都是以同一个假设为依据的，民主是如此，正义本身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可以把社会的所有决定托付给少数人，以避免臆断大多数人的理性。据估计，这样做会造成一个更加简便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会由此产生寡头政治所承袭的一切腐败现

① 奥尔托加在《走向历史的哲学》第211、215页中表述了这个假设。毫无疑问，他同样也假定：人类经过教育培养，能够与以前所表现的那样更加一致和快捷地仿效并采用理性选择的模式。这显然是一件有可能发生的好事。参见约翰·杜威的《经验与教育》(1938)一书中的观点，第100—101页：“就习惯的内在本质而言，什么都无法阻止理智方法自身变得常规习惯性……”——译者注

② 奥尔托加此处的分析与爱德华·李·桑代克的《受教育不足的人的心理》一书中的观点非常一致，见《哈珀斯杂志》，第140期(1920年4月)，第666—670页。——译者注

象。因此,奥尔托加的假设可能是最无恶意的,除非我们不愿接受为谋求人类高层次的生活所作的一切尝试,而屈服于一种非理性的动物性生活。遗憾的是,我们狡猾的动物性特征现在还具有非常广泛的、完全无理性的力量和五种功能。

当“处于时代盛时”的一个综合体呈现在现代文化面前,而那些现代文化又尚未对综合体的构想和阐述起多少作用时,人类理性可能会受到决定性的考验。对此,奥尔托加与施本格勒在研究和预言问题上再次出现了分歧。施本格勒认为,甚至像俄罗斯文化和西欧文化这样的现代文化相互间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以至于为理解不同价值观念所作的任何努力都只会引起更深的误解。奥尔托加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人们透过不同现代民族文化的表面形式,就会发现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化差异只不过是为实现人类共同愿望和解决人类相同的问题所采用的不同选择手段。基于这个信念,奥尔托加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跨文化教育能够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为此,首先要充分利用各种文化潜在的共有人性。其次,如果我们可以将他的综合体思想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应用的话——要传播每一学术领域的知识精华和主要判断观,随着各种不同文化的进化,它们就可能会逐渐结合在一起。这不仅表现在它们潜在的客观性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自然宇宙、生物意义上生命过程的条件性思想制约以及能够为社会和自然科学所启迪的一切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念上。

然而,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趋同进化究竟有多少可能性,这还未探明。不幸的是,各种现代文化互不相同,似乎的确不是一个事关优等或劣等逻辑体系的问题,因为自然选择的方法在这些体系中可能都会被运用。这倒有点像个事关矛盾假

设的问题,不同文化根据矛盾假设或公设来进行推理。就文化的本质而言,理性地建立一种文化的基本公设是不可能的,否则会使思考者陷入无限的倒退之中。或许公设的矛盾冲突最终会导致一个误解僵局的出现,这正如施本格勒所设想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化趋同进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不同的选择性公设相对时,就可能会产生某种建立在一些实用主义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结果能够得到教育强有力的支持,因为教育指明了理智合作的精神对人性的益处。

至于目前,我们只能够推断出,对于文化综合所引发的这些间接、遥远的影响仅有一点点认识,还不会有多么大的价值和重要意义。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三个都需要文化综合才能解决直接问题。

一个是科学自身的问题。只要我们目前的知识不能得到更加有效的组织和安排,科学就会陷于重复和浪费成果的危险之中。^①基于这个目的,如果具有众多普遍原理的知识领域之间不是相互依存,不是由此涉及大量数据资料的话,那么纯粹描述性的综合可能就足够了。鉴于这一点,科学本身不需要纯描述性的综合,而是需要动态的综合。动态的综合能够根据因果关系和相对意义诠释数据和资料。除此之外,只要科学家们选择对人类生活有意义的数据资料和结论推断,那么他们属于正在上升到文化综合的一个更高和更加动态的层次。从本质上看,“文化综合”这个术语的含义指的是对有关

^① 梅尔维尔·H·哈奇教授根据自己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急迫性。他引用了一个真实情况:位于马塞诸塞州伍兹赫尔的海洋生物研究所的图书馆,1940年收到不少于1257种令生物学家们感兴趣的期刊。——译者注

人类生命活动行为方式的知的选择和组织。

需要依靠文化综合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设计问题。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一样,都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危险地运用理性,并认为社会设计这项工程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工程。他们也一致认为,我们以其他手段来控制难以驾驭的工艺技术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出建议,以便引导人类活动发展的进程。我们把自己托付给了我们自己的精确完整的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设计问题涉及的诸多领域,构想出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一种知识体系,通过自身真正的努力去解脱痛苦,否则社会就会招来人类巨大苦难的惩罚。

第三个需要文化综合解决的是潜在的普通教育的问题。本书就是以此为开头的。至于普通教育领域为何需要文化综合的理由前面已有说明,而且奥尔托加也会在他的文章中进一步加以阐述。

对于对任何文化综合体系的可能性问题都持怀疑态度的那些人来说,惟一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得通过实验来确定。在过去的三年里,这样的实验也在进行之中。在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综合问题研究班”上,来自该大学约二十个系或学院的教师代表、三位教会领袖以及一些有才干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参加了这期主题为“现代文化危机”的研究班。迄今为止,有证据表明,一个涵盖价值观念、方法原理以及涉及世界本质、人类和文明概念等内容的非常重要、有用的综合体系是可能的。例如,研究班的学员已研究了因对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认识不全而造成的矛盾性人性概念,并把那些矛盾性人性概念结合在一起,确定它们各自的真实、有效性程度。当

然,这对教育、社会设计和研究都很有价值和意义。关于科学和宗教的讨论结果表明,自然主义者和虔诚的自由主义教徒之间存在的敌视态度,不是由于各自的信仰的缘故,而是因为纯粹出于无知,把一种信仰归属于另一种信仰所造成的。这一发现对现代社区生活建设性的潜在价值无需过多的强调。

战争形势可能会使许多大学教师去系统地研究普通教育问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已有一种竞争现象,都声称在普通教育方面和其他专业领域一样已具备某种精确的标准,而不是那些惯常的纯选择性的零碎标准。与奥尔托加的研究途径相比,我们尝试过的任何较现成的手段都不是解决真正问题的逻辑方法,也不足以成为体现研究和同行间友好关系的一项不平凡的活动。为此,我们要感激才智出众的奥尔托加。

霍华德·李·诺斯特兰德

【附件】**致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霍华德·李·诺斯特兰德**

马德里大学生联合会请我作一个有关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的报告。由于报告厅的音响效果很差,再加上当时我身体欠佳,我在演讲中未能详尽地阐述报告的主题。这种情况促使我后来对在报告厅演讲时用的笔记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补充,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经过补充的笔记内容。除了前言是根据当时学生思想的需要之外,你们从文稿中可以看到,我是努力围绕和紧扣着一个自认为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急于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我不认为随后出现的文稿材料超出了开展广泛讨论的范围,据此,我用非常尖锐和简洁的方法写下了自己的思想观点。

无论在哪一方面,我都未自以为对高等教育的主题作了足够充分的探讨和论述,本文只能被视做对大学理念的未来发展进程的一种期望而已。如果我们要对高等教育的主题进行权威性的研究,首先需要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作出一个清楚的说明,需要对正在兴起的一代人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一章 温和的改革精神

大学生联合会请我来此地和你们谈谈教育改革问题。^①如今,我很不喜欢当众公开讲话,在我的一生中当众公开讲话的次数微乎其微。然而,这一次我却是毫不犹豫,甘愿自己处于学生们的包围中。这说明我是怀着何等的热情来此地的。事实上,我的情绪非常高昂,但缺乏信心。显然,热情和信心是两个不同的方面。诚然,除了对那些拥有充分信心的事情之外,人类如果没有热情,那么生活将会很贫困;而且人类还会仍在地洞里谋生,人类为走出地穴和原始森林所作的一切努力,从一开始也似乎是在从事一项犹豫不决的事业。尽管如此,人类对自身理想中的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业已能够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热情,迫使自己去努力,坚持不懈地去探索思想,以实现渺茫的目标。并且,人类最终也实现了目标。毫无疑问,能够从几乎不可能的、艰难遥远的微乎其微的希望中

^① 埃莱娜·韦尔认为这次演讲是“发生在1930年秋末,也有可能是在初冬的时候”。演讲后不久本书就出版了,出版时间也是1930年;而且此书还提及《群众的反抗》是“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书”。《群众的反抗》第一个版本的出版时间虽然说的是1929年,但在版权页却注明此书印刷工作的完成日期是1930年8月26日。——译者注

激起热情,这是人类力量的生命源泉之一。至于另外在信心熏陶下形成的一种热情,并不是很名副其实,因为这种热情从一开始就确信最终会取得成功。对于那些只有当确信最终会得到回报之后才会尽力的人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我记得自己在1916年就撰文说,德国人会战败,因为他们发动战争时对获得战争的胜利太自信了:他们所有的思维都集中在要去如何征服别人的问题上,而不仅仅是想到打仗。然而任何卷入到这场战争中的人都必须做好一切思想准备,包括承受灾难和失败的准备。如同胜利一样,灾难和失败是人类活动中一时蒙上的面具。我每天都为这样的信念所驱使,使我具有清醒的认识,觉得具有太多的安全感最易使人类道德败坏。因为人们逐渐会感到太安全,所以所有的历史精英分子也不可挽回地蜕化堕落了。目前这个时代,正是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弊病之一是现代人由于技术进步和组织机构等因素易于对生活中太多的事情产生过多的自信。^①

根据人类本性的一种古老的特点,当我来到你们面前,热情很高,可信心不足,你们对此不必感到吃惊。那么,我为什么会感到信心如此不足呢?让我来告诉你们。自我最初撰写有关西班牙政府进行总体改革,尤其是有关大学改革的文章时,到现在已有近二十五年的时间了。这些文章使我和唐·弗朗西斯科·希内尔、戴·洛斯·里奥斯之间建立了友谊。在那些日子里,你可以扳着手指把所有那些认为必须对政府和大学实施改革的西班牙人数一遍,寥寥无几。任何敢说“改革”两字的人,甚至那些只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改革是恰当的人,实际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群众的反抗》一书。——译者注

上就会被看做疯子和亡命之徒。而且,不管是谁,还会被正常的西班牙社会所摒弃,注定只能过着苟且偷生的生活,仿佛改革就是麻风病。这种对几乎不容置疑的改革的敌视态度的出现,你们不要认为是由于改革者是一批激进分子,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等等。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即使是思想最温和的人一提到改革也会遭到排斥和摒弃。安东尼奥·牟拉就是一个例子。他作为保守党成员曾被保守派推上权力的顶峰;但当牟拉确信即使是最保守的观点也要求对政府组织机构进行改革时,他发现自己突然已沦落为国民生活圈的外围人物了。他想进行改革的企图为当时盛行的一句俏皮话所粉碎,人们把他比做瓷器店里的乡村警察。散布这则笑话的人没有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几年后他们的瓷器店会被骑着马的警察部队所侵占;第二,他们自己显露出了一种固执己见的态度,想维持瓷器店的现状,确切地说就是指所有的瓷器。

我引用这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为了说明当时在西班牙对任何改革,包括对政府和大学的改革,都采取了一种普遍保守固执的反对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当中那些赞成改革和倡议改革陈旧模式的人士一次又一次地被称做“大学的敌人”。我们赞同建立如学生公寓等这样的公共机构,因为学生公寓的建立,通过激励和活跃思想,恰恰是为了提高大学的福利,可我们却因此被称为大学正式的敌人。当然,那些曾经谩骂声最响的人如今正急于建造学生公寓,他们现在这样做得到的全是赞扬声。但是,与此同时,只有记住那些真正关心西班牙大学的人多年来所遭受的讥笑和辱骂,只有决意不再无休止地继续发生像过去那样令人感到可悲、沮丧和沉闷的事情,才是公正的。因为公正会使每个

人都注意到今天我们的大学确实已不同于过去的样子,尽管现在的大学离它应该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水平还有距离。

目前,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中,现实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强有力的事实根据已逐渐使那些吹毛求疵的人闭上了嘴,并且还使我们当中那些最迟钝的人也相信政府和大学都需要改革。这不是一个事关希不希望改革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付出努力,因为这些机构都没有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它们就好比是机器,由于长期的使用和滥用,已变得破损不堪了。

如今,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许多人都渴望改革西班牙的政治体制,而那些不希望这样做的人不管怎样也只好顺应和忍受这种要求。显然,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刻。年轻人,你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好运气:你们已处于决定西班牙命运的一个辉煌的时期,曙光已经出现,许多伟大的理想将会实现,这其中就有新的政府和新的大学。然而,就国家目前的形势而言,让大家都理解和接受这种观点和思想是很难的,这一点我并不比你们乐观。几乎人人都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事态的变化,而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假面具,因为这种表面上看似邪恶的面具背后隐藏着真正有利于发展的事物。现在无疑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刻,你们已迎来了一个灿烂辉煌的世纪的曙光。一个沉睡数百年的民族正在苏醒,正睡眠惺忪、行动急促地站立起来。用熙德笔下神圣古老的《熙德之歌》中的诗句来形容一天黎明到来时的情景最恰当不过了:

雄鸡连声高鸣,朝霞就要出现在天空……^①

那么,树立新的信心和发挥往日的热情,这两方面能否结合在一起,这一时刻是否已经来临了呢?对此我们暂且只能回答,“不,……还没有”。乐观地看,我已明确无误地认识到,如今展现在西班牙人民面前的是一片壮丽宏伟的前景。现在,它也是无数机遇和可能的象征,呈现在我们人类的生命活动中。然而,我们的生命活动同时又是一个把机遇和可能转化成现实的过程。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我的乐观态度有所动摇,也失去了信心。在人类历史上,潜在的发展可能不会自动变成现实,相反必须要有人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付出辛勤劳动,做出自我牺牲去实现它们。基于这种原因,历史和人类生命活动犹如在共同进行一项永久性的创造。我们的生活并未为我们提供现成可得的东西,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它恰好正是我们自己始终追求的,而且这也就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追求过程。对我们来说,完全无偿的馈赠是没有的,我们必须努力,即使我们的所作所为显得非常被动。身份低微的桑丘·潘沙在任何场合都重复着一句老话:“如果给你一头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绳子赶去。”同样,给予我们的只有潜在的机会和可能——要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去实现。例如,此时你们正在听我讲话,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你们根据事实就能知晓的,如果你们的注意力略有分散,那么你们的听讲也只不过是听而过之罢了;更进一步说,如果你们的注意力瞬间即逝,就无法注意到炮弹的轰鸣声。

刚才,我说过,目前的形势为彻底改革西班牙的政体和大

^① 见《熙德的诗》,第235行。——译者注

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这样那样的改革需要有人来实施,那么,如今在西班牙有这样的人吗?对此,我并不认为是某一个人,当然也不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通常是指那些“伟人式”的神话般的人物。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无论他多么伟大,历史不像是十四行诗,也不是一种单人纸牌游戏;它是由许多人共同创造的,由众多具有某些必备素质的人共同创造的。

既然我今天来这里抱着极其真心实意的态度和你们讲话的,同时也是表明我自己的一片诚心;并且我决意直言不讳地把话说完,因此,我们不能掩盖自己内心的重重疑虑,担心今天是否有这么一群人能够实现对政府的改革,或者说只是局限于我们现在谈论的主题,实现对大学的改革。我今天在这里这样说,但这一天很快就会过去。也许十二天或一星期之后,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出现,我希望如此。无论什么也不能阻挡这群人团结、组织起来。我如此强调我们如今缺乏这样一群人,惟一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为明天的愿望的实现出一份力。

然而你们会说:“你怎么会怀疑是否有这样一群能够完成改革的人存在呢?一旦确认一件事情的可行性之后,惟一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具备做此事的意志和决心,而此刻我们却还在这里为大学的改革吵吵闹闹。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群人是存在的。”

当然,这么说并没有错。要完成一件可行的事情,惟一需要的是意志和决心。但是,任何事情都得视对“意志”这一个简单的词汇的理解程度来定。口头上说或者只是想到要决心干某事这是容易的,但要做到真正含义上的下决心是很难的。

这里指的是要对所有必须成为中间过程的事情有决心。首先,它意味着我们自己要具有能够担负起这项事业的必备素质。因为,缺乏了这种必要条件,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决心,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结果,你只是对一种信念浮想联翩,使自己渐渐处于一种满足感官的激动与兴奋之中,并在这种矇矇眈眈、极度高涨的热情中耗费自己的力量。黑格尔在《普通历史哲学》中明确无误地指出,历史上所有重大成就的取得都需要有这种激情;但同时他又把它形容为一种“冷静的激情”。如果激情仅仅表现为狂热的情感活动,那么这种激情是无用的,任何人都可能变得如此充满激情。然而,要保持这种既审慎又富有创造力的火焰般燃烧的热情并非易事,不过这种达到炽热程度的激情饱含丰富的热能,不会因世界上两种冷漠的因素——冷静的逻辑和钢铁般的意志——同时出现而冷却下来。那种庸俗、虚假、虚弱的激情则会在反省的思维的逼迫下惊恐地退缩,因为其本身就已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冷漠的接触会使它处于濒临消失的境地。所以,富有创造力的激情特征在于它能够寻求与较冷静的优势因素之间的统一结合,并趋于完善。它能容纳反省性的批评,而同时又不会丧失创造性力量。这种火焰般的热情始终处于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意志的支持之中。

坚定不移、头脑清楚的意志和决心是我现在所无法找到的,即使是在开始阶段,在包括你们自己在内的任何一群西班牙人当中也无法找到。而没有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就会枉费心机地等待改革这项建设性和创造性工作的实施。

就西班牙所面临的问题的根源而言,无论是在政府方面还是在大学方面,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你追究一

下导致所有其他各种问题出现的最最基本的原因,你就会碰到一个事实,这用一个词就可以说明:懒散草率。^①这种现象自上而下充斥我们的整个国民生活,并起着左右和引导生活行为的作用。政府在与公民打交道时采取懒散草率的态度,有时一味放任民众的违法行径;反之亦然,政府自己也利用法律进行欺诈,把法律变成欺骗民众的工具,这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紧急状态期间通过的所谓的《生存法》,政府当时依据这部众所周知的法律的所作所为就是如此。在这部法律的名义下,出现了与实际生存问题大相径庭的一种情况。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各个省的省长们几十年来是如何利用《社团法》的,对此你们只要询问一下自己所在省的工会组织就行了。

然而,我现在的目的不是想揭露政府这种可悲的不光彩的行为。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谈论政治;再说,如果我要谈政治,也不必为此感到可悲。我的目的是想让你们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西班牙和西班牙人这种被我称为“懒散草率”的根本病症。在经历了风行一时的一阵公开演说和辩论之后,已没有必要再来大谈特谈政府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犯罪,是一种不可容忍的渎职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等。当然,事实情况也是如此,但就对政府获得的补偿性利益而言,人们的态度是如此的谦卑、愚蠢和习以为常,因而把政府的这种行为称做一种犯罪会使人们感到羞愧。说实话,从法律角度看,这确实是犯罪;但从心理客观现实讲,则是一种历史事实。“犯罪”一词具有可怕的暴力特征,因此从这一点上看,政治的行为则

^① 有人喜欢用一个稍温和些的词来解释“La chabacanería”。——译者注

相对要显得得体一些：根本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在程度上仅次于犯罪的行为。总而言之，是懒散草率，即政府在发挥其特别微妙的功能时缺乏规范、自尊和情理。

尽管如此，我并不是指在西班牙没有犯罪现象，但我确实不认为犯罪行为是西班牙所面临的主要的或最糟糕的问题。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犯罪活动一旦出现，很快就会引起反应，并得到惩治。相反，懒散草率的作风一旦出现，则会愈演愈烈，变得愈发习以为常，因为这种作风本身会给人带来一种舒服安乐的感觉，且易于传播，从而使其得以长期存在。因此，从政府和官方行为到家族生活以及个人的言行举止，它已渗透到了西班牙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大学教授会议上也充斥着这样一种懒散草率的气氛。当你穿过大学的一间间教室和大厅，甚至是在平时，也可以听到吵闹声，见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动作和姿态，感到一种几乎使人窒息的沉重的懒散气氛。^①

但是，一种思想的全部意义，只有当它遭遇到对立面的观点时才会或多或少乃至彻底地表达清楚。任何思想都有对立面，两种不同的思想在对抗的过程中展示出各自的观点特征。那么，懒散的对立面又是什么呢？我会引用你们都十分熟悉的词语，因为该词语属于体育运动词汇——“良好的竞技状态”。你们都非常清楚，一名运动员竞技状态好和坏时会有多么大的不同表现，其中的区别在于他的表现判若两人。不过，这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是要经过争取才能达到的。为了达到良

^① 多年来，我不得不一直在大学校园外找一个房间，因为我们那些宝贝学生站在学校大厅周围习惯性的高声叫喊，已使得教室里的人都无法听清自己所说的话。

好的精神状态,作为个人,他首先必须使自己进入某种状态,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同时必须投入到训练中去,放弃其他许多事情,还要具有超越自我的决心,使自己变得更加机智、兴奋和敏捷。这一切对他都很有关系,因为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可能有利于他保持良好的状态,否则就会令他精神颓丧。脑子里有了这种思想,他就可能专注地去干一件事情,而避开其他的事物。简言之,良好的精神状态意味着从来不会沉溺于种种无意义的消遣,空耗精力。而那种放任迁就自己的做法就是懒散草率的表现,比如“不管怎样随它去吧”“无所谓”“差不了多少”“那有什么关系呢?”等情况。

正像一个人一样,群体的精神状态也可能有好有坏。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能够有所作为的只是那些拥有良好精神状态的群体,紧密团结、组织完善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之中,每位成员都明白彼此在关键时刻不会令对方失望,因而整个群体就可以坚定一致地朝着一个方向迅速前进。正如费尔南多·加利亚诺教士在谈到天主教会组织——耶稣会的组织形式时所说的,“它就像是一把剑,剑柄是在罗马,而剑的尖锋则是遍布各地”。然而,一个群体不可能有这样的组织状态,除非它不断地修炼自己,能够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它准备做的事情。反之,如果目的不明确,未经仔细考虑,缺乏说服力,就无法作出明晰的判断。

所有这一切正是我前面所谈到的。但是,我仍不能肯定目前西班牙是否有这么一个精神状态极佳的群体能够担负起改革政府和大学的使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体,所作的一切努力皆会因群体缺乏必备的素质而最终只是一场空。正如懒散草率是邪恶之源一样,一场本质上懒散草率的改革显然也

于事无补。你们已经看到了由一群从来没有考虑过首先要使自身具备最基本素养的人,对国家所进行的一次任性改革。^①那其实是一个独裁统治时期。这群人所实施的变革,尽管自身也赋有难得的机遇,但已把我们国家懒散草率的状态特征带入了极其疯狂的境地。

大家要明白,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劝你们不要介入西班牙的公共事务,不要向政府请愿,更不是要劝你们放弃对大学的改革。相反,我是竭力主张你们这么去做,而且是严肃认真地去——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否则,我们现在就可以确信无疑地预言未来。如果你们未做专门准备就想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结果就会出现如此的情况。由于从事公共事务活动意味着从事那些试图去影响大多数公众的行为,并且你们也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自成系统的一个整体,而只是一个不定型的小群体。因此,历史的形成过程在这一点上是和自然科学的原理相一致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不可阻挡的,结果是多数人征服了少数人。

所以,要对大多数公众有所影响,你们自己除了是公众的一员之外,还必须具备某些重要特点,具备一种活力。换言之,就是指一个群体的良好精神状态。

假如我能够从你们身上见到一种努力使自己处于良好精神状态的决心,啊哈!那么,我的朋友们,我就不应该为自己缺乏信心而苦恼不堪。

我应该相信这一切都可能实现,而且这也确实是迫在眉

^① 独裁统治在1923年普里·德里维拉上台后就已开始,一直持续到1931年共和国成立。——译者注

睫、即将发生的事情。与一般观念相对立的是,历史也可能跳跃式前进,而不总是渐进变化。依赖于渐进变化,并认为每一项历史成就都是通过逐步准备的手段取得的观点,是过去一个世纪所犯下的一个典型的错误。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生物界和精神世界一样,自然发生的许多实际现象会突然出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

为此,我要引用一个象征性的例子来进行说明。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在上一个世纪,当古埃及三大金字塔的灿烂文化事实,已被确信无疑地认为是埃及人史无前例的最崇高的古代文明时,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非常愚蠢的看法。在整个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这一人类历史纪元开始时近乎完美的繁荣现象的发现引起了惊人的轰动。有些历史学家曾经认为,在金字塔下面进行发掘工作可能会找到一些并不是那么完美的文化遗迹,因为他们认为,古埃及金字塔成熟完善的灿烂文化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然而,当考古学家几乎直接就在金字塔底下挖掘新石器时代文明的遗迹时,结果同样令人震惊。明确地说,也就是人类几乎未经过一个过渡期就已从石器时代跃进到了文明的时代。^①

因此不存在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历史的推进经常是跳跃式的。这种跳跃式的突变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距离,被认为是经历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具有良好精神状态的一代人能够完成几个世纪来未能实现的目标;然而,我年轻的朋友们,这其中也面临着挑战。

^① 虽然以后的证据表明确实有一个更长、更重要的过渡时期存在,但此例仍能说明社会快速进化和演变的可能性。——译者注

第二章 基本问题

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局限于纠正弊端,而且改革的主要特点也不能只局限于此。^①改革总是能创造新的方法,因而弊端总是次要的。就“弊端”一词本身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是指那些孤立少见、违背常规的行为。然而,一旦这些行为变得非常频繁、习以为常、根深蒂固,并且被大众默认,那么它们就不能再称做弊端了。一方面,弊端可能会自动纠正;另一方面,即使纠正,那也是于事无补,因为这类常见的弊端已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不再被视做偏离常规的例外情况,而是错误做法的常规表现形式。事实上,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常规做法、政策方针中的一些东西,而不是由此引起的违规行为。

任何一项改革运动,如果仅局限于纠正我们大学中那些懒散草率的弊病,那么改革同样也会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草率。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常规做法问题。对此,我可作进一步说明:按常规方法建立的机构是否健全,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看

^① 第二章开头的三段文字此处已被删去。在那三段文字中,奥尔托加概括了第一章的内容,并且对他在演讲第一章内容时报告厅的音响条件表示了不满。这是本书译文仅有的一次删除原文内容。——译者注

它是否有能力容纳大量无严重危害的弊病,就像一位健康人能够承受住令病弱者倒下的压力一样。但是,在一个机构的确切使命尚未确定之前,它是不能完全按常规做法建立的。机构犹如机器,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设计必须考虑到它预期的服务职能。换言之,大学改革的实质是为了能够系统完整地体现其目标,因此,对我们的大学目标只作一些调整、修饰或变更最终会是一场空欢喜,除非大学自身已开始明确无误地、坚决果断地、名副其实地重新认识其使命。

由于未能做到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迄今为止所有出于好意而付出的努力都化为了乌有,其中包括几年前由大学教师们自己制定的方案。他们永远也无法实现一项令任何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感到充实和必要的目标,一项能使大学尽其所能的目标。也就是说,大学活动必须真正名副其实地发挥其力量,而不能由我们凭自己固执己见、随心所欲的意愿对这种永恒不变的命运进行强行歪曲和篡改。在过去 15 年里,所作的最好的尝试是做了一件最容易、但也是最无结果的事情,而不是直接明确地提出“办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以后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只是仔细地去观察、了解了其他国家大学改革的情况。

不过,我并不是要对我们通过观察邻国的改革模式来了解自己的做法提出批评;相反,这样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观察、了解并不能说明我们不作努力就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对此,我也并不是指想寻求“种族纯洁”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荒谬言论,即使我们彼此之间——人与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仿效别国的做法也会犯下致命的错误,因为在仿效的过程中,我们回避了为试图解决问

题所作的种种具有创造性的努力,从而不能从中认识到借用别国方法解决问题真正的本质,也无法认识到其中的局限和缺陷等。在此不可能有“种族纯洁”的问题,因为不管怎样,这个问题在西班牙像干草籽一样普通。我们是否得出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结论,是否建立相同的形式,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经过一番奋斗之后对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最终所取得的结果。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所作出的最佳尝试来进行推断,一直是一个谬误:英国人的生活始终是一个奇迹,所以英国的中学教育一定是典范模式,因为英国人的生活是以此为基础孕育而生的;德国人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所以德国的大学就一定是大学的榜样,因为它培养出了天才。因此我们就来仿效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吧!

从整体上看,这种错误的推断和认识是直接来自19世纪沿袭下来的。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一世:“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学院的运动场上赢得胜利的。”俾斯麦战胜了拿破仑三世:“1870年战争的胜利是普鲁士校长们和德国教授们的一场胜利。”

这些陈词滥调式的思想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种思想的错误在于,它认为一个国家的伟大是因为它拥有好的学校,即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过去一个世纪虔诚的“唯心主义”思想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它把学校认定为一种军事力量,但这种力量学校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在那个世纪,为了表示对一件事情的高度热情,或者只是为了显示出对事情的一种特别尊崇,必须把事情夸大到英雄神话般的程度。当然,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有

伟大的学校；同样，没有伟大的学校，也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但是，国家的宗教信仰、政治家的治国才能和经济以及其他众多因素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伟大与否取决于诸多因素综合体现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政治腐败，那么要想拥有完善的学校体系是徒劳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是为那些远离广大民众的少数人服务。或许有一天，这些少数接受教育的人会影响到国家的总体生活，进而会成功地改善整个国家的学校体系。

教育原理：如果学校确实是国家的一个职能机构，与其内部人为创造的教学气氛相比，它更多地依赖于它所处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平衡是造就一所好学校的一个基本条件。

推论：即使承认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是完善、理想的，它也并非是不可转变的，因为机构和制度只是一个较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整体上是与创造和维护它们的国家相一致的。

除此以外，我所描述的这种简单化推理，避免了使其受害者们去直接正视这些学校模式，避免纯粹从机构组织的内部机制去了解它们，因为参照的结构体制由于掺和了英国人的生活氛围和德国人的思想特点而显得含混不清。现在，无论是英国人的生活风格还是德国人的思想特点，都是不可能移植至此的。从其最乐观的一面看，只有不受约束的机构组织设置可以仿效，除了那些在它们自己国家普遍存在的优点之外，我们对这些机构组织的真实面目也必须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而，有人看到，德国的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已成为一个颇受谴责的对象。如果说德国科学的兴旺发达曾经依赖于大学

的力量,那么就大学作为一类机构而言,科学则并不是十分重要。幸运的是,自由探索的氛围加上德国人的天赋才能和个性,使得德国人在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掩盖了德国大学存在的本已很明显的缺陷。尽管我对英国中等教育的现状并不十分熟悉,但我发现英国的中等教育已使我感觉到那里的机构也有不少毛病。

不过,这并不需要我个人来发表意见,因为这是一个事实,英国的中等教育和德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尔,对德国的大学提出了根本性的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

由于我们最优秀的教授对于自己的问题一直愿意仿效他人的做法,或是不愿自己去思考,因而除了自己局部的具体研究领域能跟上时代步伐之外,他们在各个方面生活在一种落后时代几十年的状态之中。这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悲剧性的迟滞现象,也是人们自己不经努力就想证明自己、树立自己的信念而遭受的命运。迟滞现象的长短不是一个事关机遇的问题。历史的创造,无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源自某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是“时代精神”。这种精神状态会发生间歇性的变化,也就是说每隔一代人的时间而发生变化,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形成一代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人们只有待思想和价值观形成后才可效仿。换言之,只有等到前面的一代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之后才行。因此,当前面的一代人正在衰退,新的一代人已在实施改革、开始赋予政体一种新的精神的时候,才可采纳其思想原理。每一代人需经十几年的奋斗才能确立自己的思想,而要对这些思想进行归纳综合还需要十几年——对于爱效仿他人、缺乏真实自我意

识的民族来说不可避免地就成了年代错置式的人物了。

让我们来看看国外的情况,不过不是要去找榜样。

要确定大学的使命问题,让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如今大学在西班牙或在别国所具有的含义。虽然在作用和地位上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欧洲的大学都具有某些共性。^①

首先,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学作为一种机构,

^① 例如,在夸大英国的大学与欧洲大陆诸国家的大学之间的差异时,通常会忽视一个事实:最大的差异并不在于大学本身,而在于英国人非常特别的性格特征。国家之间应该进行比较的是大学进化发展的趋势——不是进化趋势自然变化的发展程度。由此可见,英国人的保守主义思想已促使他们要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维护那些表面现象;他们自己认为这么做是无关紧要的,而且他们确实也视之为只是想像而已,对英国的大学生活的现实来说是非常次要的。如果有人冒昧地想要限制英国人的自由意志,指责他们过于沉溺于有意识长期保存这些想像的满足之中——假如他们能够或想要这么做——这似乎是很荒谬的;然而,如果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虚构或想像,认为英国人对于自己非真实的性格是自己欺骗自己的话,那也未免太天真了。我看过一些有关英国保持大学的研究文章,它们无一例外的步入了微妙的英国式讽刺的陷阱之中。那些研究人员从未注意到,如果英国保持大学非专业性的一面——就像是法官头上戴的假发,那么主要的表面现象是不带有任何坚定信念的客观存在。而这同时又恰恰因为这种客观存在的事物过多和过时的缘故,否则它们就不可能为英国人提供他们在纯表象中所寻找的那些满足享受、消遣娱乐、惊险刺激等其他相类似的东西。在奇特罕见的佩鲁基假发的掩盖下,公正是最现代、最时新的;而在非专业化的外表下面,英国的大学在过去的40年里已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变得专业化了。

英国的大学不是国家的机构,这一点对我们的中心主题——大学的使命——同样也无任何重要性可言,但这事实上对英国人的生活 and 历史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确实未阻止英国的大学能够像欧洲大陆诸国的国有大学那样发挥基本功能。最近的研究结果会证明,即使在英国大学也是国家的机构,只是英国人对国家的概念与欧洲大陆诸民族的认识完全不同,对此,我想作出以下总结:第一,不同国家大学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与大学本身无多大关系,就像国家本身一样;第二,过去40年里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所有欧洲的大学的趋同运动已使它们变得类似了。

目的是让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高等教育。说“几乎”是因为另外还有一些专业学校存在,为此,那些独立存在的专业学校同样也引发另一个独立存在的问题。既然有这么一个例外的问题出现,我们可以把它暂且搁在一边,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推理概括,认为人们是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的。然而,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另外一种限制,这比专业学校的情况更重要。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根本不是那些本可以接受和应该接受的人,他们只是富人阶级的孩子,因此,上大学代表着一种难以辩明和开释的特权。主要问题在于能否让工人阶级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这仍是一个尚未触及的主题,对此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我认为,应该把大学的知识传播给劳动者;如果有人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话,那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知识是值得和有利的。普及大学教育问题的解决程度依赖于最初对高等教育和教学的定义如何。其次,大学对于如何使劳动者进入大学这一过程并不是非常关注,这几乎完全成了国家和政府的事情。因此,只有对我们的政府进行一次伟大的改革,才会使我们的大学能够发挥行之有效的作用。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如“大学附校”等等。^①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牢记一件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人是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的。如果许多人应该是在今后而不是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那么,下面这个论点就更具说服力。

^① 应该注意到,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的大学附校已成为培养人的谋生能力的一种重要机构。劳动者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仍然被认为不足,但这是由于我们对目标缺乏正确认识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缺乏善意的教育机构。对劳动者的教育问题感兴趣的组织和机构已多得不必再提了,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有英国的“工人教育协会”和牛津的罗斯金学院(创办于1899年)。——译者注

大学里传授给广大青年人的高等教育究竟应该包含哪些教学内容呢？它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 (1) 学术专业的教学；
- (2) 科学研究和未来研究人员的培养。

大学通过教学使人们成为医生、药剂师、律师、法官、经济管理者、公务员、中学理科和人文学科教师等等。

其次，科学自身在大学里通过研究和科学方法的传播得到发展。在西班牙，科学及科学家的这种创造性功能降低到了最低的限度。造成这一局面不是因为大学有任何缺陷，也不是因为大学未把此类活动看做是它的任务和使命，而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对科学研究缺乏一种强烈的科学欲望和聪慧的才智，这种不足和缺陷是众所周知的。不容置疑，如果科学能够在西班牙得到充分发展，那么，它会优先在大学里得到发展，这一点几乎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当做一个例子，以免我们每走一步都重复同样的一条规律：西班牙在知识活动中那些难以控制的落后现状的事实使我们发现，在别国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东西在此处只是处于萌芽状态，或只是显露出一种趋势而已。由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从基本形式入手来论述大学这个问题，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的阶段性差异是无关紧要的。近几年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足以清楚地表明，要加强我们大学的研究活动和科学家培养方面的意识和计划，简言之，就是要使整个大学机构以此发展方向为目的。另一方面，有人也可能会提出一些老生常谈、自欺欺人的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众所周知，我们最优秀的教授们对改革的探索进程具有莫大的影响力，他们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与国外的大学竞争，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既然如此,那么,高等教育包含了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两部分的内容。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现在不想深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这两项根本不同的任务竟然融合在一起。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培养一名律师、法官、医生、药剂师、中学拉丁文或历史教师与培养一名法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等是很不同的,前者是指培养从事具体工作的专业工作者,后者则是指培养从事纯科学的研究工作者。除此以外,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①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许多科学家,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是非常少的。因此,符合人人需要的专业教育与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科学研究活动融合在一起,则是令人感到吃惊的。不过,先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搁在一边。高等教育除了专业教育和科研活动之外没有其他的内容了吗?乍一看,我们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但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地审阅一下教学大纲,就会发现,除了专业实践教育和从事科研活动之外,学生们总是被要求上一些如哲学、历史等有关培养基本道德品质的课程。

就这一要求而言,我们可以从中很清晰地识别出给人印象深刻、意义丰富的某些少得可怜的遗产。我们甚至还不明白它为何仍遗留在我们中间——无论是从生物学还是从历史学角度。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它所服务的对象和目的性根本不明确,人们必须回顾历史,追溯它的进化过程,以探明它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完整积极的整体所起的作用,虽然它现在

^① 科学家的人数必须比目前已有的数量还要多,然而即使这样,与其他专业相比,科学家在人数上还是很少的。

仅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存在。^①如今,为那种古代高等教育规律辩护而提出的理由阐述得非常模糊。据说,学生们应该接受某种“基本文化修养”的教育。

按通俗的解释,“基本文化修养”这个术语的不合理性表露出它自身的不贴切和不精确。“文化修养”,指的是人的精神思想,而不是指牲畜或农作物,只能是笼统的。在物理学和数学中没有“文化培养”可言,因为那只能意味着使人在某一具体学科方面变得有学问。“基本文化修养”这一提法的实际运用说明了一个潜在的概念,即应该向学生们传授一些装饰性的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或理智。由于这个概念的目的性如此模糊,因此,学科之间几乎或多或少都显得有点不够明确、不够专门化,如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中世纪时期大学开始创立的那个时代,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如今保留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残存下来的一个并不显要的遗迹。

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不从事任何研究,^②而且与专业或职业教育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所有学科都属于“基本文化修

① 想像一下原始生活的条件,其中始终不变的特点之一是个人的安全保障。那时候两个人互相接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在任何地方都带着武器。因此,人与人之间互相接触的行为必须受到习俗和仪式的保护,以确信对方不带任何武器,而且也不会突然伸手去取暗藏着的武器。基于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人与人在彼此接近时要抓住对方的一只手——那只能给人致命一击的手,通常是右手。这就是我们互相问候时互相握手致意习俗的起源和目的。然而,由于目前的现状与那种原始条件下的生活相差甚远,因此,这其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遗俗。

②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世纪时期没有科学研究。

养”，如神学、哲学和“艺术”等学科。^①

但是，如今所谓的“基本文化修养”的含义与中世纪时期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异。那时候，它并不是为了装饰人类的精神思想或培养道德品质，相反，它是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体系是那个时代的人所固有的。因而，它也是一个当时有效地引导人们生活的包容各种信仰的综合体系。

生活就像一个混沌的世界，人类犹如在混杂纷乱的密林中迷失了方向。但是，人类的精神对困惑混乱的感觉作出了相对抗的反应：人类会努力在密林中寻找“出路”和“方法”，^②在形式上表现为某种认识宇宙世界的明确、坚定的思想，认识事物本质的、积极的信念。这些思想的整体或体系就是“文化”一词的真正含义。确切地说，这是与把它作为外表装饰性知识的特征截然相反的。文化使人类生活免于陷入纯粹的灾难之中，它能够使人类过上一种不会发生无谓悲剧或内心感到耻辱的生活。

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思想，我们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思想，生活的目的正是为了做事情。因此，正如印度最古老的书中所述的：“我们的行动听从于我们的思想，就像牛车的车轮跟随牛的脚步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并不是指任何一种理智主义理论^③——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化身。

① 此处夸张的提法从本质上并未削弱奥尔托加认为大学应该教授一种“文化”知识的观点，因为这种参照方法有助于说明问题。——译者注

② 我们的思想和信念也许是非理智的，正如和我的思想一样；但从整体上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和信念。

③ 关于“时代高度”的概念，见《群众的反抗》。

这么说来,基甸(Gideon)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可能会把人为什么总是出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问题搞清楚,也就是说,人总被要求生活在展现人类命运的某个特定的阶段。一个人的存在归属于一代人,是这代人中的一个物质组成部分。每一代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直接取决于上一代人的定位。这就意味着人类必定是在符合时代高度的标准下生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处于时代的思想高度和层次上。

文化是一个时期里的一种生命思想体系。那些思想或信仰是部分地还是全部地存在于科学领域之中并无多大关系。文化并不是科学。就我们目前的文化而言,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源自科学。但在其他文化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在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规定要求我们的文化必须总和目前的状况相一致。

与中世纪时期的大学相比,现代的大学已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惟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但现代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的教学或传播活动。

这样的变更显然是有害的,如今的欧洲正在自食恶果。造成目前欧洲形势动荡的原因,事实上是由于普通的英国人、普通的法国人和普通的德国人没有文化修养:他们对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关世界和人类的基本思想体系一无所知。这样的普通人是属于没有文化修养的新生的野蛮人,是落后于时代文明的迟钝者;而且既原始又落后,与他们自身存在的既现代又冷酷的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但是,这种新的野

^① 关于这种严重情况的分析研究,在《群众的反抗》一书中已有论及。

蛮人毕竟都是专业人员,要比以前的人更有知识,可同时又是更没有文化修养,如一些工程师、内科医生、律师、科学家等。

造成这种始料未及的野蛮无知现象,以及这种极端悲剧性时代错位症状的过失,责任主要在于世界各国 19 世纪自命不凡的大学身上。如果这样的机构一旦在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革命热潮中被撕得粉碎,那它也许不会有任何理由去抱怨。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造成的过失是无法通过其向科学提供大量出色的无懈可击的服务所能补偿的。别让我们成为受科学操纵的傀儡,因为即使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杰作,它毕竟也是因为有了人类生命活动才成为可能。违背人类生活基本条件的犯罪是不能通过科学来弥补的。

由此造成的危害已是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几乎不会被前面的一代人——早于我此刻正在演说面对的一代人——所理解。

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思想家庄子的著述中,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几个象征性人物的谈话,其中一人名叫北海神。他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等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社会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员——法官、医生、工程师等,因此,大学准备向社会提供专业培训业务。但是,在此之前,更重要的是,社会首先必须保证具备培养另一种专业的能力,即执政的专业或职业。任何社会都有人执政,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一个群体还是一个阶级。所谓“执政”,我的意思并不是指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施加一种广泛的压力或影响那样行使法律权力。如今,欧洲各社会由资产阶级所统治,而这其中的

大多数人是专业人员。所以,对这种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除了他们的专业之外,这些专业人员能够使他们的生活产生一种生命影响力,并与时代要求的高度和标准相一致。由此,在大学里再度建立文化教学,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核心思想体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大学的基本功能,也必须是大学驾凌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

如果劳动者应该成为明日的统治者,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劳动者必须按照时代的高度和标准来执政——否则他的政权将会垮台。^①

也许已有人意识到,欧洲国家在允许赋予执法官和医生们专业职称、头衔和威信之前,并没有事先弄清楚他们是否具有一个明确的思想认识。例如,有关对我们现在的世界物理概念以及对生成物理概念的这门奇特科学是否具有明确的思想认识等。对此,我们不必为欧洲的形势已到了这般境地感到吃惊。在这样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要花言巧语。我再再说一遍,对一种模糊文化的模糊渴望会使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物理学及其方法论是现代思想伟大的基本手段之一,历经四个世纪的智力训练已进入到了这门科学之中,而且它的理论是与有文化的人的上帝和社会概念、事物的孰是孰非概念以及文明生活的所有其他基本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如果没有这门科学,人也能设法将就过去,既不会感到丢脸,也不会受到谴责。对于生活在深山

^① 由于在实际运作中劳动者确实也担当过管理者和统治者的任务,和中产阶级一起共同担负执政和统治的职能,因此,劳动者必须接受大学教育已迫在眉睫。

里的一名卑贱的牧羊人来说,或是一名被土地所束缚的农奴、一名受制于机器的手工劳动者,他们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对于声称自己是医生、执法官、将军、文学家或主教的有身份的绅士而言,即那些把握社会方向的阶级人士,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对今天的自然宇宙也是一无所知,那作为欧洲人,他们犹如十足的未开化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可能非常熟悉法律、医药或罗马教皇们。至于那些对重大历史运动是如何把人类带到目前这个十字路口的问题没有清楚认识的人,我也持同样的看法。而且,对于那些对思辨哲学在当今是如何长期试图为宇宙作出规划的问题没有明确认识的人,或是那些对生物学如何努力解释有机生命活动基本事实的问题没有明确认识的人,我同样也应该这么说。

目前,我们不要因为提出律师没有学过高等数学怎么能理解 20 世纪物理学思想这样一个问题,而混淆、掩盖了上文提到的那个简单明了的观点。我们会在后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至于现在,只是让我们的思维接受这个在观察中获得的想法。没有物理(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物理科学,而是指其创造的世界生命思想体系)、历史和生物概念以及思辨哲学思想的人,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除非他碰巧具备了某些超常的素质,否则,从完全的意义上说,这种人是不太可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好法官、好的技术专家的。可以确定,他一生中所做的其他事情,包括超出其相应的学术领域的专业本身中的那部分,都将不幸地终结。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会变得缺乏理智,他与他喜欢的那种女人而开始的感情方面的事情也会变得粗鲁和荒唐。他会给自己的家庭生活带来一种虚无狭隘的气氛,进而使养育孩子的过程出现反常和扭曲的现象。此

外,在外界与朋友交往时,他则会散布荒谬怪异的思想,散布一大堆幼稚无聊、虚张声势的言论。

没有任何其他办法:为了能在混乱困惑的人生道路上满怀信心地前进,人类必须要有教养,必须知道表面状态——“出路”和“办法”。任何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生活时代和环境,简言之,就是时代的“文化”。我说,这种文化要么被人们所接受,要么被重新创造。那些独自一人努力创造文化的人,独立完成人类三千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是惟一有权力对大学必须从事文化教育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上这类可能会反对我的观点的独行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疯子!

文明得等待 20 世纪的开始和到来,才能目睹令人震惊的场面:那些只精通或专于一件事情而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全然不知的人是多么的残酷、多么的愚蠢,然而他们却又是多么的冒失狂妄和肆无忌惮。^① 职业作风和专业研究两者之间缺乏足够的平衡作用,使得欧洲人被彻底地摧毁,他们因此迷失了所有要求他们达到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却正是他们所非常需要的。工程师掌握了工程学方面的技术知识,但这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是欧洲人的一个方面:全面发展的完人是不会从像“工程师”这样只具备细小一部分的局部技术知识的人身上找到的。所以,对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当有人说“欧洲已化为碎片”时,觉得像是在用一种巴洛克风格的夸张手法在说话,然而,此人所说的话要比他所猜疑的更加真实。诚然,我们正在亲眼目睹欧洲走向崩溃,这是欧

^① 见《群众的反抗》中“专业化的野蛮状态”一章。

洲人在无形当中逐渐碎裂的结果。^①

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就像一个七巧板拼图玩具：我们得把那些分散的碎片重新聚集起来，组合成一个完整生命机体——欧洲人。我们必须做的是，每一个人或诸多个人（不必是乌托邦式的）应该成功地成为一个整体的全面发展的完人。如果不是大学，有什么力量能使这种愿望成为现实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第二种办法。大学必须在它已在努力行使的职能中增加这项重要的额外任务。

就此而言，在西班牙以外的国家，一场旨在把文化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方向，或者说是向新的一代人传授世界和人类的思想体系的运动正在蓬勃开展。这个思想体系已经在过去的一代人中趋向成熟。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大学的教育包括下列三项职能：

- (1) 文化的传授；
- (2) 专业的教学；
- (3) 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的培养。

如此说来，我们是否已经回答了我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根本没有！我们只是把如今的大学认为必须行使的职责进行了汇总。根据我们的判断，这项工作并未施行，但是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只是已准备了问题，仅此

^① 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不可能不清楚；但在19世纪的三代人和20世纪的第一代人当中，这个观点也可以通过列举出逐渐碎裂的几个明确阶段（时期）得到进一步阐述。

而已。

几年前,哲学家舍勒(Scheler)和教育部长贝克尔(Becker)对大学的这些职能是否应由一个机构还是由多个不同机构来行使的问题进行过辩论。但在我看来,这样的争论似乎没有必要,或者说至少不是主要的。^①这种做法也是徒劳的,因为所有这些职能最终会在学生身上融合在一起——它们最终都会围绕学生青春期这个共同的中心发挥作用。

但是,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像目前这样,教学只局限于专业事务和科学方法,结果学生们仍有多得惊人的课程要学习;甚至程度比一般学生好的那些学生在学习时,面对大学声称要传授给他们的知识,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然而,一个机构因常人而存在,正因为如此,机构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只有特殊生物存在,那可能就不会有机构存在,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政治机构。因此,有必要考虑到机构是针对天赋一般的普通人而言的。机构是为人而设的,因而,人必须是建立和设置机构的参照计量单位。

让我们姑且认为,在大学里,我们按原状找不到任何值得被称做是弊端的内容,一切都是按照大学自身所宣称的那样顺畅正常地运转。非常好!尽管这样,我也应该说如今的大学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弊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谬误。

对于一名普通学生来说,要掌握大学试图传授给他的所有内容是不可能的,因而接受失败已成为大学生活的一

^① 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大学改革思想》(莱比锡:Quelleu. Meyer, 1919)。马克斯·舍勒:《德国大学的内部矛盾》,见《西德周刊》第32期,第493—495页;第33期,第511—512页;第34期,第524—527页;第35期,第539—541页;第36期,第551—553页。——译者注

个组成部分。换言之,接受失败作为一类经常发生的常规事情,使得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大学努力实现的目标是一种错觉。我们接受了大学内部生活的虚假和不真实性——它的真正本体是由自身的篡改歪曲行为所构成的,而这正是整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生活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最初的过错是由于把自己自命为并非真正自我的形象所造成的。我们努力按照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去造就自己,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佯称自己不同于真实自我的人物,自欺欺人,并对真实自我的错觉显得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堕落的行为。当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习惯性行为是错误的时候,那它下一步的行为就完全是属于道德堕落。而就道德堕落来说,任何人在不丧失自尊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甘愿其本性受到歪曲篡改的。

那就是为什么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说:“想做不能做的事情的人,就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情吧。”

列奥纳多的这句格言从一开始就必须成为改革大学的一条真正的行为准则。只有真正下定决心才会结出硕果。不仅大学的生命活动,而且人类整个新的生活,都必须由手工艺者们来重新制作,进行改革,因为手工艺者的思想是真实可信的(注意这一点,这里指的是较年轻的一代人,否则你就会被弄糊涂了)。

那么,一个机构试图给予其不能给予和得到的东西,那它是虚伪腐化的。然而,这条具有欺骗性的原理却存在于目前大学的整个规划和机构组织之中。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目前的大学进行彻底地改革。恕我直言,我们必须严格坚持一条截然相反的原理,这是我们

所得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依据某种乌托邦式的愿望,我们必须只教授那些能够被教授的知识,即能够被学会或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教授认为应该被教授的知识。

我将努力详细阐述这条原理的含义。

实际上,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大大超越了高等教育的主题,它涉及了各个教育层次的重要问题。

教育学领域中所取得的重大历史进步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在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和德国理想主义的思想启发下,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在一些常见的问题上,人们的观念也有明显的变化。在教育过程中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教什么(知识、智慧)、教师和学生。然而,由于有某种特别的盲目性存在,教育过去一直是以知识和教师为中心的,学生在教育学中根本不是一个基本要素。卢梭及其追随者的创新思想只是把教育的重心从知识和教师转移至学生身上,认为只凭学生及其性格特点就能够使我们努力把教育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知识和科研有它们自身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对其他的传授知识的活动是不适用的。教育学原理与文化科学所依赖的原理是迥然不同的。

但是,我们必须作进一步的论述,而不是专注于研究儿童或青年学生的性格特征。我们要把论述的主题限定在我们目前的意图上,从比较实在的观点、角度来认识和看待儿童和青年,这样做更确切些:把他们看做学生和学徒。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个实际问题:不是因为儿童年幼或青年人年轻而促使我们探究被我们称为“教学”的这项特别的事业,而是由于某种并非那么复杂的因素,事实上也是出于某种非常确定、非常简单的理由。

第三章 教育的经济原理

政治经济学在战争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与诸交战国的经济情况一样处于严重衰退的状态。因此,除了对经济学整个知识体系进行彻底地重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这么做对一门科学的生命来说通常是有利的,因为知识重建的过程会迫使它去寻求比已在运用的原理更加稳固的基础,去寻求更加普遍和基本的原理。然而,事实上,由于一个令人窘迫的显而易见的原因,目前的政治和经济是在它的废墟上兴起的。令人警觉的是:经济学对潜伏于人类经济活动背后的基本原理会作出必然的反应。人类为什么从事经济职业、生产、经营管理、贸易、储蓄和估价等活动?那是因为出于一个令人吃惊的因素,一个独一无二的原因:人类渴望和要求做的许多事情并非是无量丰富的,而是相对有限的。如果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是大量存在的话,人类就不必、也不会想到要不知疲倦地进行经济方面的努力。例如,空气在通常情况下不足以引起我们称做经济的活动。但是,一旦空气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稀少之后,它就立刻会引发经济活动。又如,教室里的孩子需要一定量的空气,如果教室很小,空气不足,那么就涉及到一个经济问题,结果自然是需要建一所更大的学校,费用、开支相应也就更高。

另外,恕我直言,即使我们的星球一直是在太空中旋转,地球上的空气也并非处处一样的。“纯净的空气”只是在某些地方,在一定纬度和特定气候的条件下才有,因此“纯净的空气”是稀少的。这个简单的事实在瑞士人中间激起了一场强烈的经济活动,他们每天都在兴建饭店和疗养院,试图把这种稀少的原材料(纯净的空气)转化成增进人体健康的要素之一。

我再说一遍,这其中的道理既令人吃惊又非常简单,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供不应求或物质稀少是引发经济活动的基础。事实上,几年前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以“稀少性原理”^①为出发点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修改。爱因斯坦也多次说过:“如果有永动存在,就不会有像物理学这样的科学。”同样,我们可以肯定天堂里不存在经济活动,因而也就没有经济学可言。

我相信这种情况对教育也具有类似的作用。为什么会有教学活动存在呢?它为何是人类的一种职业,是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呢?对于这些问题,浪漫主义者的回答是美妙动听的,是先验性的。他们利用人类的一切事物和大量神学的知识,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总是需要用饰有绿叶的图画和略微传奇的情节来遮掩事物的真实本质。而我们则相反——年轻人,我说的不对吗?——我们乐意接受不加掩饰的事物(至少目前暂时是这样),而不需要加以更多的装饰。我们喜欢它们

^① 古斯塔夫·卡塞尔:《理论政治经济学》,1921年版,第3页。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是对某些古典经济学立场观点的再现,以反对最近60年里出现的经济学观点。

不加遮掩的真实的特点,我们不介意冷酷无情。我们知道生活是艰苦的,而且将来仍会是艰苦的。我们接受艰苦、严酷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不想使命运变得世故、复杂化。正因为生活是艰苦的,它的美妙壮丽之处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未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即使生活是艰苦的,那它也是实实在在、坚定不移的,毕竟不带有任何虚伪矫饰的成分。我们在处理事物时注重坦率和诚实。我们喜欢不加矫饰地、真实地对待事物,而且当事物变得毫无遮掩时,我们还喜欢把它们洗干净,进行认真研究,以看清它们在纯自然条件下的真实面目。

人类从事和热衷于教育是基于一个简单明了、毫无浪漫色彩的原因:人类为了能够满怀信心、自由自在和卓有成效地生活必须知道很多事情,但儿童和青年的学习能力都非常有限,这就是原因所在。假如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时间分别都是持续一百年,或是儿童和青少年都具有无限的智慧和注意力,那么就不会有教学活动存在。然而,即使那些颇吸引人的先验主义的理由永远起不了作用,人类本来也还得要培养通常被称为“教师”的这一类人。

缺乏学习能力是教育的基本原理。由于学习者不会学习,就必须要为教学作好恰如其分的准备。

教育在接近 18 世纪中期时蓬勃兴起,并持续发展到现在,难道这不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吗?这种现象为何不早些发生呢?理由很简单:正是在那个时期近代文化首次走向繁荣成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短时间内人类积极活跃的知识宝库在一次巨大的增长过程中得到扩展,人类活动正在进入一个活跃的新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一切正是由于最近丰富的发明创造而成为可能:人类活动随即也就呈现出了一种新

的、惊人的复杂情况,人类此时正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知识。因此,除了必须学习、了解远远超越学习能力的大量事物之外,教育学也迅速得到了加强和扩展,以满足形势的需要。

另一方面,在原始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教育存在。^①因此,如果几乎没有教育的必要——学习能力大大超过所要吸收的知识需要,那么,为何还要有教育呢?否则,能力将会过量。那时候,只有少数的几个知识科目、若干个神奇的公式和仪式存在,用以制造像独木舟这样最难造的工具,或是为了治病和驱逐恶魔等,这就是当时所有存在的知识学科内容。既然知识内容严重不足,因此,任何人都不必特别费力就能学会和掌握。由此,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证实了我的观点。教育是以一种颠倒的形式呈现在原始人中间的:教学职业实际上成了一项隐瞒知识的职业。那些神秘的公式被作为秘密隐藏起来,只是向少数人秘传,尽管局外人本来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习和掌握的,如神秘仪式的普遍现象等。

当一种优于以前所有已知知识的特别新奇的知识产生时,这种现象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它在任何层次的文明阶段都会重新出现。由于新产生的、令人羡慕的知识最初只是少量地存在,因此,它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它的传授因而也只是在一种小心提防的秘密状态中进行。如此说来,这正好符合了毕达哥拉斯流派的精密哲学原理,甚至也符合了非常开明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思想。我们还保存着柏拉图著名的第七封书

^① 尽管我们所能注意到的原始文化确实向年轻一代传授了大量有关动物学和解剖学、植物学、社会习俗乃至部落文化间不同人生观等方面的知识,但这个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和有根据的,因为原始文化并未遭遇到像我们如今所面临的重要知识激增的这样一个难以想像的问题。——译者注

信。柏拉图写此信的目的是为了向那些指控他的人提出抗议,因为有人指控他曾把自己的哲学原理传授给了叙拉古的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仿佛他把哲学思想传授给外人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所有的原始教育虽然几乎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授,但都是秘传的,因此,原始时期的教育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教育是对立的。

于是,当需要获得的知识与学习能力不成比例时,教育就出现了。如今,文化和技术财富之丰富大大超过以前,以至于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威胁,因为任何一代人都觉得要吸收如此繁多的文化和技术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我们的教育学、教育方法和机构建立在一条简明的原理的基础之上:儿童或青年学生无法学习和掌握所有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的知识——教育的经济原理。

既然如此,只要哪里有教学活动,这条原理就总是一直在起作用;不过,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所以,它在程度和范围上是有限的。而且,它的确立从来都未被视做一条原理,或许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未引起关注的缘故——它没有提及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先验论。

现在,西班牙的大学犹如生长着充满各种类型的热带林下灌木丛,而其他国家的大学更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增添我们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内容——文化教学,那么青葱的灌木丛就会有完全遮住地平线和视野的危险:青年们的视野必须是清楚开阔的,为的是可以毫无遮掩地看见迷人的光亮。针对这种膨胀浮夸的过度生长现象,除了奋起与之相抗,运用经济原理这把短柄小斧进行砍伐之外,没有别的补救

办法。因此,首先要做的是彻底地进行修剪和整枝清理。

经济原理不仅指需要对所提供的教学内容和题材进行充分利用,它还有更深远的意义: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大学的建设都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而不是以教师或知识为基础,大学必须是按照学生比例体现规模大小的一个机构。学生具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他是学习能力有一定限度的人;其次,他为了生存必须掌握知识。

目前发生的学生运动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在十种常见的因素中,有七种纯粹属于打诨,其余三类因素则是绝对合理的。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整个学生运动是正当的行为。第一,国家政局动荡,国家的灵魂被扰乱。第二,少数教师的一系列既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的腐败行为。第三,事实证明,根本不是学生或其他任何人,而是时代本身和当前全世界的教育现状正在再次迫使大学要把学生放在中心位置——为学生服务,而不是为教师,正如当初大学处于最兴盛的发达时期那样;^①这是影响学生的一个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学生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代的发展趋势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虽然人类受到时代发展的推动,但可能对现状认识不清,无法对其作出解释或下定义。学生们应该驱除他们活动中的不可信因素,要注重突出上述提到的三个

^① 这对于中世纪巴黎和波伦亚的大学来说是正确的。据说巴黎已有一种“教师体制”,以相对于其他大学的“学生体制”。然而,即使在巴黎,学生们通过他们“国家”的组织在维护纪律和风纪方面都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译者注

因素,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本身都是完全正确的。^①

因此,我们必须以普通学生为起点,把迫切需要学生掌握,并且一个正常的普通学生能够真正掌握的教学内容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把它看做大学的中心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

我再重复一遍,从根本上说,这才是大学应该做的。目前我们要弄清楚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还要弄清楚其他同等重要的几件事情。不过,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不要把各种事情混淆起来:要把大学这个威严庄重的机构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和组织结构细致地区分开。

我们该如何确定构成主干或最低限度部分的课程体系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复杂的知识体系进行考察:

(1) 我们必须弄清楚哪些东西是学生将来的生活必不可少的。生活对人的条件要求是毫不留情的,它是对遮住青年视野的灌木丛进行第一次挥刀修剪整枝的指导标准。

(2) 修整后留下的东西被裁定为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些内容还须再作进一步的缩减,以达到学生能够真正学会和理解的程度。

然而,仅有各种不同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是不够的,我们极

^① 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必须得到贯彻,以达到能够影响其物质组织的程度。像过去一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把大学看做教授接待学生的房子的观点是荒谬的;事实上应该是恰恰相反:让学生来管理大学这幢房子,使全体学生成为机构的躯干和骨架,而教员或教授们则作为辅助或补充。通过礼仪指导官实行的纪律维护行为引起了令人难堪的争吵,使学生们成了一群反抗者。不要责怪学生,该责备的应是设计、规划不善的机构。所以,以此目的合理组织起来的学生自身应该引导大学的内部管理,决定习惯和行为的礼仪,实行惩戒措施,肩负起维护风纪的责任。

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会突然超越学生的学习能力。如果我们只是大叫大嚷地说哪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显然是荒谬之举。只有当被传授的知识能够真正为学生所学会和掌握才行。在这一点上，我们绝不能动摇，虽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巨大的。

第四章 大学的基本 功能：大学、专业和科学

根据前面论述的几个原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大学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和主要组成部分,普通人应该接受高等教育。

(2) 首先应该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达到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由此可以认为,大学的基本功能是教授重要的文化学科,即:

- ①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
- ②有机生命的基本主题(生物学);
- ③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学);
- ④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学);
- ⑤一般概念的体系(哲学)。

(3) 必须把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专业人员。除了文化训练之外,大学能够通过利用人类智慧所发明的最经济、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步骤和办法将普通人培养成优秀的医生、法官、数学教师或历史教师。然而,为了便于进行更充分的讨论,我们暂时不谈这种具体明确的专业教育特点,先把它搁置一旁。

(4) 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普通人必须或应该成为科学家。既然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推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例如科学研究,对于大学的基本

功能而言,在其任何直接的功能组成部分中未占有任何位置,它是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大学和科学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大学又必须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场所呢?这个问题我们将会作进一步的探讨。

毫无疑问,上述这个极端的观点会招来大量蠢话连篇的指责,就像笼罩在地平线上的一块乌云,预示着一场倾盆大雨的来临。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我意识到有一些严厉的反对意见;但是,我们在指出那些反对意见之前,一定注意到了任何人在谈及他事先未曾想到的一个问题时,都会突然冒出一连串唐突之词。

要理解我此刻所阐述的大学的构想,需要你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彼此极为不同的三件事情:科学、文化和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或专业。

首先,让我们来区分专业和科学。科学不仅仅是你们所想到的那些内容。显然,为自己买一架显微镜或匆匆拼凑成一个实验室的做法并不属于科学研究,而且阐述或学习一门科学的内容也不是科学研究。从真正严格意义上说,科学单指调查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及其解决的办法等。然而,一旦得出问题的解决办法,随后依照问题的解决办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科学研究。^①这是为什么说学习或教授一门学科与运用科学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原因。尽管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有一些保留意见存在,但对担负学科教学任务的人来说,如果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的话,那可能是最适当不过了。不过,

^① 除非重新提出疑问,并在评论过程中把它转变成一个问题,由此而重复科学调查研究的循环。——译者注

这并非是必须的。事实上,一直以来,许多出色的学科教师并不是调查研究者,并不像科学家那样,虽然他们对自己的学科非常熟悉,但是熟悉并不等于研究,因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和发现真理;反之或是为了证明一个谬误。了解和熟悉一门科学指的是人的意识对真理的吸收,是对确凿无疑的事实的掌握。

在希腊,当科学研究初露端倪时,也就是在几乎还没有现代的科学存在时,人类几乎也同样不敢把科学与非科学的东西混为一谈。他们过去常常用来称呼科学的词语带有探索、创造性劳动、研究的特点,甚至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同代人也都没有找到一个与“科学”这个现代词汇完全相配的词语。他们提到 *historia*、*exetasis*、*philosophia*, 这些词在含义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细微差别:“一门探索的学问”、“一门发现的学问”、“一门学科或科目的系统处理方法,或科学调查研究”——而不是“知识的拥有”。“*philosophia*”一词的出现相对要晚一些,它的出现是想区别于一般的学识,即这些新颖的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想变得有学识,而是为了寻求知识。^①

科学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追求和成就之一,其崇高程度要胜过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大学本身,因为科学就是创造。而教学只是旨在传播和吸收已创造的东西,引导学习者去吸收已创造的东西。科学的发展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的发展必定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过程。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科学把

^① 关于“*philosophia*”这个新奇的术语所引发的惊人效应,见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

普通人排斥在外,它所涉及的是一种非常少见、与人类一般常规活动相距遥远的行为,科学家就像是现代修道士。

妄称普通学生可成为科学家,这是一种荒谬的托词和虚荣表现。要不是由于受乌托邦思想缺陷的影响和感染,这种虚荣心本来是不会被传染上的(虚荣心就像感冒和别的炎症一样,是要传染的)。然而,甚至是在理想状态下,希望普通人成为科学家的妄想也是不可取的。即使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追求之一,它也不是惟一的,因为生活中还有许多同样高尚的追求,牺牲那些同样高尚的追求而把人类的一切都献给科学,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崇高只属于科学,不属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虽然科学家所从事的职业与其他行业一样,是一种有限的、狭窄的生活模式,但事实上他要比你所想像的面还要宽。在此,我不会着手研究“科学家”一词的含义,也不愿这样做,否则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我要说的一些话可能会不讨人喜欢。既然那样,那么我们再把话题回到那个基本问题上来。我们从时代特点出发,至少可以注意到,作为活生生的人,真正的科学家通常是喜爱幻想、行为奇特的,只要他们的精神没有完全错乱。这种数量有限的科学家能够比较独立地对待事物,这是非常可贵的,是真正的奇迹。他们看到的是珍珠,而不是隐藏着珍珠的牡蛎。把科学家理想化,并把他们作为榜样让所有人来效仿,而同时又未考虑复杂的条件因素,这么做纯属徒劳,因为有些条件是不可思议、超自然的,有些是深不可测、不可理解的,它们往往在培养科学家的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①

专业教学和真理探索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区分开。教师和学生从思想上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两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因为目前把这两方面混淆在一起的现象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和学习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熟悉、掌握诸多学科的系统化知识,不过这些内容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科研本身。普通学生并不需要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条总的原则。内科医生学习如何治愈疾病,而且作为内科医生他也不必再学得更多。就内科医生的目标而言,他需要知道当前最新的生理学知识体系,但他无需,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生理学家。然而,我们为什么对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非要苦苦期盼呢?我不明白,我只是对这种自欺欺人的愿望觉得讨厌。说什么“你总得有自己的幻想”之类的话,正是这类永久性的膨胀的妄想,顽固僵化、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思想,驱使着我们企图实现我们无法实现的幻想。最终,乌托邦思想导致了教育学的自我谴责。

只考虑自己的愿望、幻想是儿童们的德行,并且装装样子许愿也是孩子们会做的事情;而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要做的是必须下定决心去做,去实现愿望。现在我们只有集中精力,限定自己,才能实现目标。生活的真实之处就体现在对我们进行自我界定的过程之中。诚然,一切生活都是命中注定

^① 科学家一直易于对专制政府持默许态度,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根本不是令人感到失望的一个因素,而且也不能被视做社会的不利条件。其中的原因在于科学家真正的本质——非常值得尊重的本质。

的：如果我们的生活在时间和形式上是无限定的，那么，就可以假定生活是没有“命运”可言的。^①但是，年轻人，真实的生活就在于快乐地接受无可变更的命运——一种我们无法发现的限定或局限。正是这种精神境界，神秘主义者出于一种深奥的直觉常常将过去称为“天恩眷顾”。

如果一个人内心具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成为一名内科医生——仅此而已，那就别让他涉足科学研究，因为他只会把科学研究置于一种平庸的境地。事实上最最重要的是，他做一名优秀的内科医生就已足够了。另外，对于想成为一名优秀中学历史教师的人来说，我也持同样的观点。那么，在大学里的时候，对他传授一种他将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复杂的认识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而你们又得到了什么呢？你们迫使他零零碎碎地学习那些历史学家从事科研所必须的技术而耗费时间，然而这些技术又是与历史教学无关的。另一方面，你们结果却使他未能完成另一项任务：掌握人类历史总体部分的一整套明晰清楚、结构有序、易于理解的思想体系，而这又恰恰是他将来从事历史教学所要履行的使命。^②

这种“探索性研究”在大学里占主导、支配地位的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后果，一直是灾难性的。它忽视了一项最最重要

① 奥尔托加使用的“命运”(destino)一词，就和亚里士多德使用“δύναμις”(可能性, potentiality)和“ἐνέπεια”(现实性, realization)一样，在释义上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英文译者对此词尚未找到一个满意的翻译词语。有机体被设想成赋有某种明确可能性(potentiality)的生命，现实性(realization)构成了有机体固有的生命过程。“命运”一词，也和其他词汇一样，将会在本文以下的内容中带有另指的含义。——译者注

② 显然，他必须学习历史赖以形成的技术方面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必须成为一名熟练的技术专家。

的内容:文化,它转移了对如何最有效地培养未来专业人才这个问题的注意。

医科大学极度渴望给学生们讲授生理学和化学,然而,或许世界上任何一所医科大学里的人都不会严肃认真地去仔细思考做一名优秀内科医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医科大学应具有怎样的模式等问题。除了文化之外,专业问题是最紧迫的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受托于天命的恩惠。但是,我们混乱的程序和常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在两方面都起着作用,科学也因我们美好的愿望要把它与专业相提并论而受到了损害。

迂腐和缺乏思考已成了引发“唯科学主义”思想的出现的主要因素,而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想一直困扰着大学。糟糕的是,在西班牙这两方面的力量正逐渐产生一种严重的不利影响。在德国或北美的学校或实验室呆过六个月的任何一个笨蛋,已取得三流的科学成就的任何一个学舌者,回到西班牙后都成了科学的暴发户。他们根本就没有片刻思考过大学的使命问题,却提出了最迂腐、最荒谬的改革。而且,他们甚至都未具备能够教授自己的课程的能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整体上掌握相关的学科。

因此,我们必须把科学从专业中区分开,只保留绝对需要的那部分科学,目的是为了指导专业本身,因为当今的专业教育显得非常混乱。在这一点上,一切都还待重新开始。^①

^① 每一个专业的观念或原型——当一名医生、法官、律师、教授等等的真正含义——目前在大众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清楚的认识,而且也没有人致力于这个概念的研究和阐述。

符合逻辑的组织结构和巧妙的教学方法可能会使专业教育变得更加有效,使教学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扩大,而且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也都会比现在少。

不过,现在让我们接着来探讨科学和文化之间的另外一个不同点。

第五章 文化和科学

如果我们大体上了解了专业和科学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可以得出几个明确的观点。例如,医内科就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专业。它是实践性的,以恢复和维护人类健康为目标。针对这个目标,医内科对觉得有用的东西会加以吸收和利用:它会转向科学,获取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成果;但同时又把科学研究的其余内容搁在一边,尤其会放弃最具科学特点的内容——疑难未定的问题的研究、解决等。这一点就足以从根本上区分医内科和科学之间的不同。科学的特点在于竭力解决疑难问题,它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做得越多,就越能不折不扣地完成使命。而医内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应用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问题的解决办法碰巧具有科学性,那就更好了;但它们未必都是这样,因为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可能是从经历一千年左右时间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的,而科学却还未能对它们作出解释或确证。

在过去的 50 年时间里,医内科甘愿自己受科学研究的影响而不能自主,忽视了自己的使命,未能正确地表述出自己的

专业观点。^① 医内科在过去的整个 50 年里已养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恶习：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对待命运，并尽力成为其他的东西——从这一点说，就是想成为纯科学。

对此，我们不要犯任何错误。科学一旦融入专业之中，就必须与其纯科学的地位相分离，并作为专业技术要在一个新的中心和一条新的原理基础上重新得到组织。而且，如果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必定会对专业教学产生影响。

我们也可以相类似的观点来说明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我看来是最清楚不过了。然而，我不仅想让读者对文化的概念具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且还要说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首先，读者必须设法仔细琢磨和反复思考下列一段摘要，尽管这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不过更好的提法是，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事实上，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始终根据构成其生活方式真正基础的某些明确的思想而生存着。我把这些思想称为“生命性的”，意思是指，那些指导一个时代社会生命活动的思想简直就是我们各种积极、主动的信念的集合，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和我们同属人类的人而言的；而信念则又是针对事物价值的级系而言的

^① 从另一方面讲，当医内科致力于发挥其治病救人的真正功能时，它的行为对科学来说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现代生理学在此基础上是从 19 世纪初兴起的。不是科学家而是内科医生摒弃了主宰 18 世纪生物学的经院哲学思想（生物分类学，解剖学等等），运用实效主义理论实现了他们的紧迫使命。见埃曼努埃尔·拉德尔：《生物学理论史》，第十一卷（1909）。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觉得此书越来越受欢迎。

——哪些应该更受到尊重,哪些不该受到尊重。^①

是否具备所有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无论是何种类型,信念是每个人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惯于把你们的生活和下一代人的生活指称为“人类生活”,这种现实存在的情况与生物学的内容相差很远。作为研究生物有机体的一门科学,生物学和任何别的学科一样,它的研究至多只是某些人为其奉献他们的“生活”的一项工作。“生活”一词最基本、最真实的含义并不是生物性的,而与一个人的生平有关。它是人类语言中始终存在的一种含义,指的是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每个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一项巨大的任务和使命;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人类世界的格局中维护自己所处的地位,沿着自己的一条道路前进。“生活的目的事实上就是要和世界打交道:关注世界,投身世界和致力于世界。”^②如果说这些构成我们生活内容的行为和做法是我们本身自动产生的话,那么造成的结果就不会属于人类生活,因为机械性被动行动的人是不能生存的。问题的整个症结在于生活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现成准备好的。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时刻向前行进,作出自我的决定。我们任何时刻都需要为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定:人的生活就像一个永远反复出现的难题。人为了确定眼前这一刻或下一步将要做的事情,被迫构想出某种计划,即使是简单的、幼稚的计划。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就要制订一个计

① 参见奥尔托加的《现代题材》,第76页:“文化只是我们教化自己动物性潜能的一项特别的指令”。——译者注

② 引自我的《国家,青年和狂欢节》一文,见布宜诺斯艾利斯1924年12月的《民族报》;《旁观者文集》第七集转载。

划。人的行为从本质特征上说如果不是根据某个计划进行,那么无论是尊贵或卑贱的生活还是明智或愚蠢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①甚至,即使我们顺其自然把生活处于命运的摆布之中,我们在一时失望之间也要拟订一个计划。任何人都必然只能在生活的道路中谨慎行事,或者说,当一个人为自己将要付诸的每一个行动作出决定时,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为他这么做是认为自己的行动在特定条件下“似乎是最好的”。这就等于说任何一种生活都是被迫的、无可奈何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以本身的判断为自己辩解。自我辩解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我们说“生活就是要按计划行事”,还是说“生活对人类就像是在进行不断的辩解”之类的话,我们所指的是同一个事实。但是,这种计划或辩解表明,我们已获得了有关世界的一些“思想”,了解了世界的一些情况,还掌握了我们在潜在可能的行动与世界之间的一些关系。简言之,如果人对所处环境作出的反应没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那么他是不能生存的;因此,他被迫要对自己周围的世界,对自己处身于世界中的所作所为作出理智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是我前面所指的思想或信念的全部。这些思想或信念是任

^① 生活的高贵与卑贱、明智与愚蠢恰恰取决于对生活的计划。显然,我们的计划在生活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总是在变化着。生活和计划相互间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何人类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这一点现在已是非常明确。^①

这其中的大多数信念和思想并不是由克鲁索(Crusoe)式的个人所创立的,相反,他们只是接受信念和思想,从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时代——出发。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信仰体系,而有些只是其他时代的遗留物。但是,总是有一种最新的思想体系存在,一种赋有时代本质特征的思想体系,它代表着时代的最高境界和层次,这种体系就是时代的文化。生活层次较低、思想陈旧落后的人被迫过着低微卑贱的生活,而且生活也更加困难、更加辛苦、更加粗俗。这是思想落后、迟钝的民族或个人的贫穷原因之所在。他们的生活就像坐牛车那样缓慢,而别人的生活则像坐着汽车快速地超越他们。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够真实、不够丰富、不够敏锐。相对而言,对生活在低于时代文化水平层次的人来说,他们是注定要过着低于人类层次的类人猿式的那种生活。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五百年前,人们把信念寄

^① 我们很容易地注意到,当自我辩解这种我们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不规则地发挥作用时,由此而造成的后患是严重的。事实上,对奇特古怪的一类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在《群众的反抗》一书中,已对这类奇特古怪的人作了研究。然而,此书第一个版本中的论述并不完整,我因为长时间生病,未能完成这项研究任务。在以后出的版本(1944年10月版)中,我增加了研究的第三部分的内容,较详细地分析了“辩解”这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由此为书中这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的研究内容增加了结尾部分。

托在教会身上,文化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教会。

因此,文化和专业一样,利用科学做了相同的事情,文化借助科学的一些必要因素解释了我们生命存在的现象。科学的大量内容并不是文化,而属于科学技术,反之亦然。文化需要我们对世界和人类具有一个全面的思想认识,文化不能因科学绝对精确的理论方法碰巧完结而停止不前。在科学对宇宙世界未做出科学的解释之前,生命是不能等待的。而且,我们在未做好准备之前,也不能把生活拖回到过去。生活最显著的特征是强制性:生活总是急迫的,它直截了当地面对着我们,容不得任何的拖延。而只作为生活诠释的文化,与生活本身相比,也不能够再等待下去。

这就使文化和科学之间的差异更加突出。科学并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某种事物。如果一名物理学家必须依靠其科学思想生存,那么,你就可以确信无疑地认为,他不会如此过分地讲究细节,并不是非要等到其他研究者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去完成他的研究。他会问能否研究出一个完整的科学方法不抱任何希望;反之,他也会用相近或可能实现的愿望来代替空缺。目前,物理学原理缺乏大量精确的证据和资料,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证据和资料将是始终不足的。

科学的内部运作与生命无关,而文化的内部运作却与生命有关。科学对我们生活的迫切需要无动于衷,只专注于自己的需求。所以,科学的发展永远是无限限制的,越来越多样化、专门化,永无止境。然而,目前文化是从属于我们的生活的,它在每时每刻都必须是一个完整、统一和连贯的体系——生活的计划、穿越生活丛林的道路等。

把思想比做道路或路线的比喻手法和文化本身一样非常

古老,它的起源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茫然困惑的境地时,我们就像面对密密丛林而站立着,因怕迷失方向,无法在杂乱的树林中前进。这时,有人对我们的处境进行了解释说明,提出了一个妥切的主意,于是我们突然之间感受到了一种启发——理解领悟的“亮光”,茂密成排的树木就像是穿越丛林的道路。由此,“方法”一词就经常性地与“启蒙”、“启发”、“启迪”等词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们所称的“有文化修养的人”要比一百年前所指的“文明人”含有更丰富的意义,例如,能够以清晰的眼光看到生活道路的人。

让我们暂且抛开所有关于启蒙和文化的模糊概念,因为这些概念从表面上看就像悠闲自在的生活的某种装饰附属物,不可能会有更错误的曲解。文化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存的一个方面,就和手是人的一部分那样。事实上,人没有手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人就不再是正常人了,是残疾人。对于没有文化的生活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当然这只是从更加基本的意义上说的。没有文化的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不真实的生活。未能跟上时代要求的人的生活将是不正常、不健全的。换言之,也就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欺骗自己。

尽管仍有某些表面迹象和假设存在,但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度“无文化”的时代。恐怕普通人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地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文明世界也从来未充斥着如此多的弄虚作假、欺诈骗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人是坚定明确地在生活中把自己置于恰当的位置。人习惯于在生活中依靠规避手段而自欺欺人,在自身周围想像出一个非常简单、个人专断的世界;尽管仍在起作用的良心责备和告诫迫使

他去注意他所处的真实的世界,一个与现实存在的整体相一致的世界,一个非常错综复杂、残酷无情、步步紧逼的世界。我们的普通人尽管会做出一切勇敢的姿态,但是,在本质上都是胆小畏怯的。他们感到害怕,害怕承认和接受这个会对他们提出很高要求的真实的世界。因此,他们宁愿歪曲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封闭起来,生活在对世界认识虚假的、过于简单化的思想概念之中。^①

因此,把大学“启蒙”的基本功能归还给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的世界,如果这是确凿无疑的话。

就本人而言,我应该把文化系确立为大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核心。^②我已勾勒出了文化系学科的基本框架,其中任何一个学科都会有两个名称,我们会记住这些名称的,如“世界的自然体系(物理学)”。这种双重称谓的目的是使人想到一门和生活休戚相关的文化学科与文化赖以产生的一门相关学

① 关于这个主题,参见《群众的反抗》(1944年10月版)。我在书中较详细地谈到了如今人们正在歪曲篡改自己生活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手段和方法。例如,像“你得要独断独行”这样天真幼稚的信念,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谎言,以及文学界和哲学界近年来出现的年轻的西班牙“知识分子”等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② 本书读者以给予一个群体过多的责任和权利为由,对这种形式提出反对意见。美国的学院或大学更有可能试图通过一个代表全体教师的委员会解决行政管理问题,委员会作为改革先锋能够民主地激发和协调大学各个方面出现的创造性。另外,也可成立代表全体教员的其他委员会,以负责改善研究条件。而且,每一个专业系科可以任命一个由相应的学术和社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检查、督促职业培训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关于奥尔托加基本思想作出适应性变化的情况,在编者即将出版的关于文化教育和跨文化综合的著作中已有详细的论述。该书暂定于1945年由 Harpor and Brother 公司出版。

科之间的区别。文化系“教员”不会详细阐述物理学，不会把它当做学生致力于物理学研究学习的一门科学。文化中的物理学指的是经过精密推论得出的关于自然和客观宇宙活动的思想综合体系，因为这些思想是在迄今为止所完成的物理研究基础上产生的。除此以外，这门学科还将分析、研究获取知识的手段，因为物理学家依据获取知识的手段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以，有必要对物理学原理进行论述，并且还需细致地追溯物理学原理演化的历史过程。物理学原理演化过程中形成的最后要素将会使学生想像出十年、一百年或一千年前人类生活所处的“世界”；经过对比，学生将能够意识和体会到如今我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

现在是回答一个表示异议的问题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在本文开头就已出现，只是被搁在一旁，暂时未被论及。问题是这样的：怎样才能使不精通高等数学的人去理解目前事物的概念呢？数学方法的应用使得自然科学的基础领域每天都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如果这里暗示的观点是正确的话，我希望读者无一例外地能够想到人类可能会面临的悲剧，或者说，人人都会被迫成为一名彻底的物理学家，尽心尽力把毕生都献给研究事业，^①而不至于过着一种不恰当的、对我们所处的世界毫无见解的生活。否则，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得听天由命，从某种程度上说注定要过一种愚蠢的生活。物理学家对于大街上的人来说，就像是某类赋有魔力般神圣知识的生物。因此，除了别的

^① 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必须注意到任何人的奉献行为都意味着献出自己整个的一生。

观点以外,上述这两种解释和回答问题的方式都将是荒谬愚蠢的。

不过,幸好并不存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首先,我所辩护的原理和理论要求教学方法从普通教育阶段到大学都需进行完全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对科学加以准确地区别和认识,我们就可以为分离科学中的文化成分作好准备,从而使得这些文化因素可以被吸引同化。“教育的经济原理”的含义不会因通过排除学生不能学习、掌握的学科而可解释清楚,它要求的是在对仍需教授的课程的教学中强调经济原理。从这两方面看,经济原理的运用会使学生的学习能力留有新的余地。这样,学生所学的知识事实上就能够比目前所学的还要多。^①因此,我相信,将来上大学的学生都已经掌握了物理、数学的公式,至少他们有足够的理解这些公式。

数学家们对自己的研究学科的疑难之处往往略有夸大。数学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学科,但对于熟悉情况、内行的人来说,它毕竟可以用一定的术语来表达。如果说数学这门学科如今仍然显得难以理解的话,那是因为在解决数学教学方法的简化问题上没有投入必需的力量。由此,我才有机会第一次非常郑重地公开发表意见。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培养这种理智力量——不是指在常规研究行为之后致力于描述性分析研究所作的那种努力,而是指在未牺牲科学的本质特点和实质性内容的情况下致力于科学精髓的简化和综合的任务——那么科学自身的未来将会是灾难性的。

^① 恰恰是由于教学效率的原因,一种更大的学习力量要求能够被投入和发挥作用。

目前,科学工作的分散和复杂化现象应该通过那些补充型的科学活动来弥补,努力使知识得到浓缩和巩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针对知识综合的特有功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特殊人才。科学的命运已到了危急关头。

其次,我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为了掌握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思想——科学基本思想所赋有的原理、常规方法、最终结果等,学生们就必定先得接受正规的训练,并且要熟知科学技术。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一门科学在其自身内部的发展过程中涉及了需要熟知技术才能够被理解的思想,那么,它的思想正在丧失其基本特征,成为从属于科学的一种因素,而不是科学本身固有的物质成分。^①精通高等数学对了解科学的构成非常重要,但不是为了理解其针对人类生活的思想意义。

德国恰好是在科学领域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一个既值得称颂又无可争议的国家,这让世人感到既幸运又不幸。除了才智超人和爱好科学的特点之外,德国人天生具有一个极难根除的弱点:他们是头脑迂腐、思想不易受影响的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者。这个现实情况已使得我们目前科学的不少方面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些能够轻易被聚集的学究式的细枝末节。欧洲必须迅速完成的任务之一是除去当代科学中纯德国式的赘生物,除去其中的旧习惯和纯粹的怪念头,从而使科学

^① 最近的研究表明,数学本质上是完全工具性的,而不是基本性和物质性的——就像是一门研究显微镜的学科分支。

的基本组成部分免于遭受污染。^①

如果不恢复文化学科,欧洲就无法挽救了,而且这种文化学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代使用或滥用过的那些学科更加精确严密。任何人都不可逃避,甚至连那些科学家也是如此。如今,这类人士维护着许多封建暴力、利己主义和傲慢自大、虚荣浮夸、自命不凡的行为。

我们有必要使那些上世纪中期持对抗意见的科学家们变得人道些。令他们感到惭愧的是,他们任凭自己为顽固主义教条所污染;而这种顽固的思想教条从那时起就一直是时代流行的庸俗和虚假风尚的体现。^② 科学家再也不能承受他们现在面对的悲哀的重演——对事物的认识过于粗俗,没有文化修养。幸运的是,目前,一代科学家的主流人物已从内心感觉到有必要对他们所研究的学科用一种相对称的文化来进行专业平衡;而其余的人将会像跟着领头羊的羊群那样,追随他的步伐。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知识已处于一种分散、零碎的状态。从各方面看,我们迫切需要对知识进行一次新的整合。不过,这项工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在甚至能够与我们以前的教育水平相媲美的高等教育方法论都尚未出现和存在的

① 不要忘记,读者在试图理解这个观点的涵义时,本文作者所掌握的知识有五分之四是在德国学习时获得的。如今,我对德国无可争议、杰出卓越的科学比以前更具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前面暗指的问题与此无关。

② 在道德方面,目前这个时代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使普通人(非普通人从不会落入陷阱)相信那些掩盖这种反抗欲望的行为是荒唐愚蠢之举,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这种粗鄙的伎俩和卑劣的行为,尽管我们可能会随时承认大多数反抗性事物都应该被埋葬。明亮之星是纯怀疑主义反抗的守护神。

情况下,是不会想到这些的。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完整的大学教育学——尽管这个观点乍一看似乎是不正确的。

因此,当务之急是发明一种方法,以能够处理我们所拥有的知识的积累的问题。人类对此再也不可能回避了。只有找到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知识急速积累和增长的问题,人类最终才不会沦为知识的受害者。我们只会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中加入科学,目的是使生活简单化。如果科学使生活变得有条理,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对科学进行改革,为了其自身健康永恒的发展,对它进行重组——要知道对科学进行严格系统、标准化的控制和管理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必须使科学富有生命力:我们必须使科学具有一种与人类生活相符合的形式,因为科学的创造首先是依靠人类生活实现的,而且也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否则——由于把自己置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乐观主义思想的阴影中对我们无益——科学将会停止发挥其功能,人类也会对科学丧失兴趣。

因此,通过思考大学的使命问题,通过探索大学文化系科(系统综合的)前因后果的特征,你就可以明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方大大超越教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它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寻找出拯救科学自身的一种替代力量和因素。

必须彻底实现知识的综合和系统化,使之能够在“文化系科”中得到传授。由此将会产生迄今为止只是当做一类异常行为而存在的一种科学创造能力——综合的能力。由于客观情况的需要,正如一切创造性劳动所不可避免的那样,这种能力指的是专门化的能力。不过,这一次人类将会专门研究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建设问题。导致研究与具体问题相分离、

令研究变得四分五裂的趋势和因素,使得采取补偿性的控制手段已成为必要——正如和任何其他健康的有机体一样,补偿性的控制手段将会通过一种朝着相反方向运作的牵引力而得到补充,把分散的科学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综合体。

富有这种创造性能力的人,与那些陷于自己研究工作的教授相比,更容易成为优秀的教师。已造成大学和科学之间混乱状态的坏处之一是教授职位的授予问题。为了跟上时代的步履,对研究人员而言,他们差不多都是差劲的教授,而且他们认为,教学工作侵占了他们在实验室或档案室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我自己在德国几年的求学经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曾和好多我们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关系很密切,但是,我从他们当中还尚未发现一名优秀的教师^①——因此,人们勿需对我说,作为一个机构,德国的大学是一种典型或榜样!

^① 这并不是说没有,但也确实表明了同时既是科学家又是优秀的教师的人是很少的。——译者注

第六章 大学的“附加”功能

“经济原理”的作用在于限定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把它们看做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它使我们得以这样来确定大学的主要使命:

(1) 从严格意义讲,大学是为了把普通学生教育成为有文化修养、具备优秀专业技能的人。

(2) 大学不会容忍教学大纲中有任何错误、虚假的内容存在,它会规定学生们学习他们真正需要的知识。

(3) 大学由此避免了普通学生因自命将来会成为科学家而白白浪费时间的现象出现。为了这个目的,将科学研究排除出大学的核心部分或将它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是适当的。

(4) 文化学科和专业学科的设置将会根据最好的教学法——系统、综合和全面的教学法——以一种合理的形式进行,而不是按科学喜欢的形式顺其自然地进行,如特殊问题、科学“样例”、试验等。

(5) 教师的选择将不会以他们作为研究人员的职称为标准,而是依据他们的综合能力和教学才能。

(6) 当学生的学习期限从数量和质量上都缩减至最低限度时,大学将会灵活地处理其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

我相信,在认识到大学所能达到的限度的同时,这种严肃

经济的要求,这种认真忠诚的态度,将会促使大学最基本的需要得到实现:大学生生活必须明确无误地与大学本身特有的功能和其真正的限度相符合,从而使大学的生活可能会在其内部的运作中显得真诚和忠实。我早就建议,新生活的开始应该把这种对个人或机构的简单认识看做一个出发点。除此以外,只要我们将希望的种子插进大自然丰饶的沃土中,那么,我们对自己、对私立机构和国家所提出的一切希望将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为大自然首先需要的是与之命运相符合所必要的最低的限度。欧洲已处于一种病态之中,因为欧洲人自称自己是站在人生阶梯的处境可危的第十个梯级上,却未首先努力设法在人生阶梯最基本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梯级上站稳脚跟。命运是人类生活及其一切志向和愿望所依赖的惟一基础。而建立在任何其他基础之上的生活都是虚假的,缺乏真正的个性。这就像悬浮在高空中的某种虚幻渺茫的东西,它缺乏一个确定的落脚点。

现在,我们可以毫无顾虑、毫无保留地敞开思想,来考虑一下大学应该具有的其他一切“附加”功能。

诚然,大学的含义不可能如我们目前所确定的那样单一。而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可从广度和深度上去认识科学针对大学的生理机能,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针对大学的心理特点所必须发挥的作用,因为把大学当做一种精神比把它当做一个机体更为合适。

首先,我们已知道文化和专业并不是科学,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科学的滋养。没有科学,欧洲人的命运将会令人难以置信。综观历史,欧洲人所代表的是决意要靠自己的智能生存的一类人,而科学只是一种“处于良好状态”的智能。

或者说,在世界诸多民族中,只有欧洲人拥有大学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大学就是一种智力,而智力则是建立在一个机构中的科学。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相比,这种把智力制度化的观点是欧洲人的独创,它体现了欧洲人根据自己的智能生活的一种独特的决心。而其他民族的生活则是依据别的才能或能力。记住黑格尔在总结宇宙历史时所表述的文字,语言精辟简练之至,就像把数吨石碳精炼成少许钻石的炼丹术那样:波斯,光明之国(指神秘宗教)!希腊,恩惠之国!印度,梦想之国!罗马,帝王之国!

欧洲人的智能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这也是欧洲能够认清自身局限的惟一力量——因此也证明了这种力量是何等的富有才智!它在欧洲自身的限制中通过科学找到其无比伟大、高贵的范畴。

在大学里,假如文化和专业都孤立存在,而且与日益蓬勃发展的科学和各种研究没有任何接触,那么文化和专业无需多长时间就会被日趋严重的、丧失活力的经院哲学所替代。科学必须围绕大学的中心部分安营扎寨——实验室、讨论室和研讨中心。科学是高等教育赖以生长和汲取营养的土壤,因此高等教育的根基必须触及各类实验室,并发掘这些实验室所供给的养分。所有普通的大学生将会往来穿梭于大学以及这些位于大学边缘和外围的有关人类和神圣事物的科学营地,他们在这些科学营地中会发现一些纯粹从科学的观点出发而设想出的课程。至于教授们,那些较富有才智的也会成为研究人员;而其余纯粹作为教师的则仍然会在科学的评判以及科学的促动和激励下与科学保持最密切的接触。然而,有一种情况不允许出现:大学的中心部分与围绕大学的边缘

研究区域之间形成混淆不清的局面。大学和实验室之间有不同之处,两者就像一个完整生理机能过程中的相互关联的两个器官。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只有大学本身才具备一个机构的组织特征;而科学研究是一项活动,它过于崇高和精巧而不能成为一个机构的组织部分。科学既不能被强迫,也不能被管制。所以,试图把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融为一体,而不是让它们相互协作、自由地交流结果,并且互相之间产生深刻的影响,这样做对两者都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大学不同于科学,但又离不开科学。我本人应该说,“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

但是,这额外的“附加”功能并非仅仅因为它与大学外部现实接近而属于大学,现实是恰恰相反的。而且,现在我们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不必担心出现误解。大学在能够成为大学之前必须是科学性的。一个充满激情、努力运用科学的环境是大学存在的先决条件。正是因为大学不能由表现为无所限制的精密知识的科学构成,所以大学需要用科学的精神来激发生机。当然,除非这种精神是预先假定的,否则本文中所讲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了。科学代表着一所大学的尊严和地位——尽管失去尊严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尊严是一个机构的灵魂,它增加了机构的生活宽度,并使之免于成为一个机械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学还具有“科学的附加功能”的意义之所在。

然而,大学仍然有其他的功能。^① 大学不仅需要与科学

^① 在本文中,我有意避免说出大学里道德教育的问题,为的是能够集中注意力论述知识内容的问题。

进行长期、永久的接触,否则就会萎缩退化;而且需要和公共生活、历史事实以及现实环境保持接触。所有这一切根本上都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处理,而不是使之成为经过故意删改、削减的局部内容。大学必须对其所处时代的整个现实环境开放,必须投身于真实的生活,必须整个地融入外部环境。而且,所有这一切不仅仅因为生活在快速变化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符合大学的目的,同样,人民的生活也确实需要大学的参与,需要大学发挥其作用。

对于这一点,我仍然可以讲许多,但为了简洁起见,我只提及一个事实:当今社会集体生活的“精神力量”是新闻舆论。共同的生活是历史的真正的生活,^①它始终需要接受指导,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就生活本身而言,它没有形式,没有眼睛,没有可供引导的方位感。在我们这个时代,古代的“精神力量”——来自教会和政府方面的力量已经消失。因为教会已放弃了现实(而人民的生活却永远是一件明确的时事);另外,又由于民主胜利,政府不仅已经放弃了对人民生活的支配和统治,而且政府的行为反而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转而落入了惟一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控制之中,这种精神力量就是新闻舆论,它必然要关心时事。

除了出于其他一些目的,我不想过多地指责新闻记者,因

^① 奥尔托加先生已阐述过这个概念——“文化是有机体,是历史真正的主体”——见《大西洋》杂志(马德里,1924年),特别是第24页,以及他为施本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所作的序言。奥尔托加先生不依赖施本格勒得出了这个概念。有关对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概念持怀疑态度的难点问题,已有所论述,详见梅尔文·雷德:《永不妥协》(Macmillan, 1939),第239页和第306页;又见埃莱娜·韦尔编辑的奥尔托加的文章,收入《走向历史学的哲学》一书。——译者注

为我考虑到自己也是一位新闻记者。但是,我们对精神实在具有不同的价值作用这一显而易见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是徒然的。这些精神实在具有一个价值等级体系,而在这种级系中,新闻业占据着一个次要的位置。但是,实际出现的情况是,如今已既没有压力也没有权力使公众意识和感觉到这些精神实在,从而使这种非常低下的精神水准为新闻舆论所采纳和利用。由于这种水准非常低下,以至于新闻常常不足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反而成为一种相反的力量。由于别的一些力量的缺乏和疏忽,使得培养和指导公共精神的责任落到了新闻记者的头上。新闻记者不仅是现代社会最不具文化修养的一类人之一,而且还把失意、泄气、对真正精神的东西满腹怨恨的假知识分子纳入他们的行列——对于后者,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仅仅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另外,新闻记者的职业使他们能够根据时代的现实情况领会到一种短暂的激情;不管是什么激情,都没有注意观察问题的视角或结构。当然,真正的生活是纯现实的,但新闻记者却扭曲了这种自明之理,他们把现实的东西视为是暂时的,进而又把暂时的变成是轰动性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世界的形象在当今的公众意识中就显得完全颠倒了。另外,新闻舆论中报道人和事的篇幅与它们起初持久的重要程度也成反比。在报纸和杂志栏目中占突出位置的是那些“成功、胜利的事情”,能够声名远播、使众人皆知的事情。即使书刊除去通常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思想和主题,即使日报依据自己的观点一尘不染地避开金钱的任何影响,新闻舆论本身仍然会摒弃其固有的使命而彻底地展现世界。我们这个时代荒诞不经、普遍存在的混乱状况是由于新闻舆论作为惟一的“精神力量”无可置疑

的支配影响所造成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就像是一个头着地、朝天晃动着普通平庸的双脚的人)。

对欧洲来说,如何扭转、改变这种荒谬的现状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而且,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大学必须介入,就像大学在时事中所发挥的作用那样,从自己的观点——文化的、专业的和科学的观点^①——出发对待和处理当今时代的伟大主题。因此,大学不会只是一个为学生服务的机构,也不会因故意删改而退缩。在生活最紧张激烈的阶段,大学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一种主要的、高于新闻舆论的“精神力量”的权利,在狂热之中保持平静,面对轻浮无聊和恬不知耻的愚蠢行为保持严肃性,把握理智。

只有这样,那么大学才会再一次迎来它的一个宏伟壮丽的时刻:西方历史上一泓不息的清泉。

^① 例如,对于像外汇这样现在一直困扰西班牙的问题来说是难以预料的,因此,大学不应该为认真的公众开设有关这种复杂的经济问题的课程。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